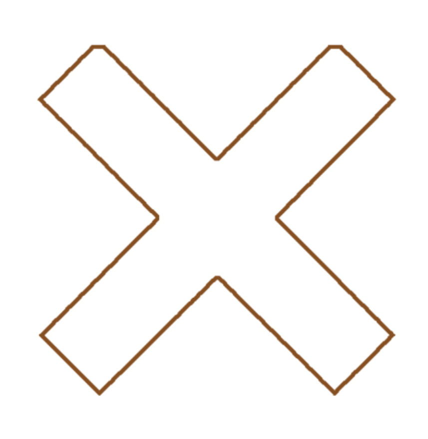
# 一五一十周刊

NO. 100
2013年 3月29日







## 一五一十周刊百期特刊



# 编者的话

“被消失的文章重获关注，被删改的文章完整展现，被忌讳的话题得到讨论，被热炒的话题得到冷静分析。”

这是两年多之前，我们在一五一十周刊创刊号的编者按中写下的愿景。如今，在周刊出版至第100期的时候重读这句话，我们感到欣慰，因为我们未忘初心，始终在朝着这样的方向而努力；但我们又心怀不安，因为我们知道，要真正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过去两年中，一五一十周刊与你共同见证了中国的大事件和小细节。回顾周刊的主题，我们可以触摸到中国跳动的脉搏——从中日关系到重庆模式，从“公知”污名化到莫言获奖，从香港“反国教”到《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我们始终跟随着重大议题，在众声喧哗中撷取精华文字与你共享。

但比起这种“嗅觉”的敏锐，我们更在意的是：是否在这些具体的议题上尽最大努力提供了理性、深入——并且常常是别具一格——的信息和观点。

在我们看来，每一期的周刊，都是一次“重写词典”的尝试。实际上，周刊两年多来在做的事情，就是在不断地用更丰富的材料、更理性的态度、更多元的维度来重写、修订我们每个人脑中的词典，让大家意识到：“哦！原来这事不是这样的。”“原来这个人没那么简单！”翻过一期又一期的周刊，读者脑中的很多词条或许已经被重写：香港、印度、民主、媒体、大学、信息自由……这项工作将是无止境的，从某种



程度上来说，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在不断重写自己的词典，如果哪一天我们脑中的词典不再更新，那我们也就走上了衰老和死亡的道路。

本期周刊，是我们的第 100 期特刊。我们邀请了多位作者与我们继续“重写词典”。我们设计了一个 10×10 的表格，每一行是一个名词，每一列是一个形容词，当这些名词和形容词一一结合，便碰撞出了 100 个空格，100 个话题，100 次重新认识这个世界的机会。

周刊的作者和编者填写了其中的 19 个空格，其中包括：科幻作家韩松谈科技与正义，NGO 人士安猪谈个人成长，记者闾丘露薇谈言论自由的底线，专栏作家笑蜀谈两岸文化交流，作家冉云飞谈家庭生活中的自由……

我们为你——每一位周刊读者留下了 81 个空格，在表格中还有可以由你自行选择的一个名词和一个形容词。我们欢迎读者通过各种方式与我们交流，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多个空格，向我们分享你心目中对于某个议题的认识。我们希望这期特刊是开放的、相互激荡的。下周六（4 月 6 日），我们还将在北京举行周刊百期纪念沙龙，并邀请读者到现场与我们分享自己的见解，具体的信息请留意 Co-China 论坛在各平台上发出的通知。

从今天起，一五一十周刊的期数进入了三位数时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加努力，迈向我们在第 1 期中许下的承诺。



1510 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每周出版一期，通过网络发布，所有非一五一十部落的文章均经过作者或首发媒体的授权，期待大家的关注和建议。

| | 自由 | 平等 | 正义 | 理性 | 民主 | 繁荣 | 另类 | 中国特色 | 理想 | X |
|---|---|---|---|---|---|---|---|---|---|---|
| 言论 | | | | | | | | | | |
| 选举 | | | | | | | | | | |
| 市场 | | | | | | | | | | |
| 教育 | | | | | | | | | | |
| 文艺 | | | | | | | | | | |
| 科技 | | | | | | | | | | |
| 公共卫生 | | | | | | | | | | |
| 家庭 | | | | | | | | | | |
| 个人成长 | | | | | | | | | | |
| y | | | | | | | | | | |

（Ctrl+双击座标系中的图标可阅读相应文章）



# 【言论×自由】

## 关于底线问题



阎丘露薇：电视记者、主持人，现供职于凤凰卫视

> “遭遇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来自于权力对媒体的监管，而在其他没有新闻管制的地方，会来自于资本，当然，很多时候，资本的背后，依然是权力。”

每个学期给新闻系的学生上课，总是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日后工作，现实和课堂上学习的东西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也经常被采访我的同行们问到：作为一个媒体人，如果现实和理想产生对立和冲突，该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给学生们答案，我唯一可以分享的是我自己的选择：我会设定一条底线，只要不触线，那我会继续坚持在这个行业，这个岗位，因为我会觉得，坚守的付出，比离开，对这个社会更有帮助，因为我还存有希望和期待，期待自己还有其他人的坚守，可以一起把底线慢慢的推高。

如果说，十八年前，当我开始媒体人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的底线只是不说假话，那现在，我的底线设定在尽量多的说真话。这样的底线很卑微，我知道，也因为这样，会遭遇很多人的批评，认为过于犬儒，但是每个人努力的方式不同，有的人选择对任何事情都不沉默，有很多同行的底线比我远远要高，我敬佩他们，但是此时此刻，我接受了被动选择对有些事情保持沉默的现实。

我知道我的选择让我可以安全一些，也知道我的选择让我被很多人看不起，我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底线可以提升，而且我也相信会有那样一天。

但我知道一点：底线的改变只有向上，不能够向下，因为一旦突破，只会一低再低，一个人也就再也谈不上原则。如果，一旦底线被突破，我会怎样？我说过，我会离开，因为那个时候的坚守在我看来已经毫无意义，只剩下虚假的自我欺骗和幻想。



遭遇理想和现实的问题，在中国内地，来自于权力对媒体的监管，而在其他没有新闻管制的地方，会来自于资本，当然，很多时候，资本的背后，依然是权力。

看到对当年香港亚洲电视六君子之一的前辈的采访，他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那时社会气氛、经济情况不同，我肯定会找到工作。如果换了今日，辞职 3 年也找不到工作，我或者会后悔！"

在这个过来人眼中，君子和英雄，也许都要靠时势来造就，不过也确实没有错，对于一个新闻人来说，底线可以设的多高，自己的勇气可以有多少，需要公众和社会的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够和权力以及资本抗争。当年六君子辞职，每个人都有好几份工作追着他们，但是如果放在今天的香港，老板们只会避之不及。

这很可悲吗？确实，就好像当美国的同行们在抗争默多克的扩张的时候，读者们并不在乎，一些资深的同行选择离职，就好像在大海里面滴入的一滴水，掀不起波澜，但是我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一些事情，已经触及到他们底线，留守，只会改变自己。

其实媒体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毛病同样会反映在媒体身上，要改变媒体身上的问题，媒体之外的人如果不参与，那注定敌不过资本和权力。

虽然在微博上，媒体人，学者，法律界人士等等，关注着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事件，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距离社会的大多数，到底还有多远？如果这算是一条底线的话，是不是能够坚守？如果不了了之，然后会怎样？主管官员是否明白，已经慢慢提升起来的底线一旦被突破，那对于一家媒体意味着什么？

【返回目录】



# 【言论×平等】

## 新媒体能促进话语权平等吗？



黄海：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

与其他权力形式相比，“话语权”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软性权力——它不是强制命令，而是通过议题设置、是非判断、价值取向等多种手段，暗示、诱导、感染、说服，以支配舆论，使人们自愿地按照某种规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正由于这种权力不易察觉（因而极具迷惑性）且关系到人心向背。在传统媒体年代，话语权一直被国家机构小心控制，是不容有失的宣传阵地。

时代改变了。李开复所言“微博改变一切”或许不无夸张，但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确实打破了传统的话语权结构。最明显的变化是，话语权不再为国家宣传机关专有，所有个体都可以加入公共舆论空间，形成广义上的“自媒体”，成为话语权的潜在争夺者——微博让话语权结构日趋扁平，政府终于失去垄断人心的可怕权力。

这一变化固然值得欣喜，但话语权垄断的结束远远不意味着微博这个公共空间上等级消失、话语权均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微博让线下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移植”成为网络上的话语权，因此强化了权力的不对等。在新浪微博粉丝超过十万的账号中，几乎清一色是娱乐明星、企业家、资深媒体人等社会精英阶层，他们的微博往往一呼百应。若在传统媒体年代，精英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或许仅仅局限在其所在的行业，但动辄上百万的微博粉丝让他们的话语权早已超越自身专业，覆盖到其他社会领域。在最近的“央视 315 晚会”事件中，一些大 V 在微博上“8 点 20 分发”的丑态让人心寒：这种一呼百应的权力如果不被善用，会给公共空间带来怎样恶劣的影响？



另一个让话语权难以平等的原因是：公共讨论为发言者设置了一系列门槛，包括逻辑推理能力、知识储备、信息资源等范畴。一般老百姓很可能没有这样的综合能力就公共事件发表原创性见解，因此更加倾向于顺从具有权威性的“意见领袖”观点。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微博上的“意见领袖”有相当一部分由媒体从业者构成，这一群体的工作性质本身就是对信息作出处理和分析，因此比其他领域的从业者信息资源更丰富，就公共事务发言的成本更低。

既然追求话语权的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任务，草根用户在新媒体平台能扮演什么角色呢？要知道，话语权不对等并未直接扼杀公共讨论的可能性。每一个个体都是新媒体的参与者。在理想的公共讨论环境下，个体能够坚持公共讨论的话语伦理和论辩规则，与掌握话语权的意见领袖进行良性互动，营造理性的讨论氛围——这样能够最大程度上消解权力结构带来的操纵和盲从。

而一个最危险的可能性是，掌握新媒体话语权的精英群体，其发言在缺乏有效的公共讨论机制的环境中，分析让位于姿态，理性逊色于情绪，甚至受权力裹挟。这样一来，在追随者的吹捧和反对者的谩骂的双重浪潮之下，微博会最终沦为一个众声喧哗的名利场。

**参考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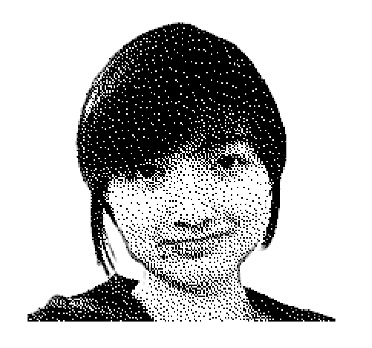
1. 胡舒立等：新媒体与中国转型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0070212477.html
2. 许纪霖、唐小兵等：公共舆论的历史、现实与反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mht/article_2013021877151.html
3. 王秀宁：微博名人的特权悖论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whpl/2012/1120/71406.html
4. 祝东力 社会结构与话语权之争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wh/shsc/article_2012111470978.html

【返回目录】



# 【言论×理性】

## 公共讨论如何更理性？



宗洁：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 “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通过理性的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2013 年 3 月 1 日，香港政府对进出口规例的修订生效，16 岁以上人士离开香港最多仅能携带 2 罐 36 个月以下婴幼儿食用的配方奶粉，这宣告了由大陆奶粉安全问题衍生出的“奶粉水货客”行业风光不再。新规发布后，“香港限购奶粉”成为了新浪微博当天十大热门话题之一，有接近 200 万条微博讨论该话题，并在接下来几天时间里持续发酵。大范围讨论不仅折射出中港关系磨合中的阵痛，亦体现了我们在公共讨论中基本素养的不足。

最开始对“限购”与“限带”的误会，经过有影响力微博账户的转发而广泛传播，引发大量网友的负面情绪。而后续讨论中简单粗暴地给事件定性，过于轻率地认为利伯维尔场和管制是不兼容的，以及市场供给可以很快回到均衡状态。对意见不合者贴标签，情绪化上升到人身攻击的层面，不仅剥夺了两地民众了解彼此观点的机会，更忽略了我们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内地食品安全？如何全面评估政府出台的政策？以及，在思考香港和大陆，无论是经济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民间观念层面的时候，说理的起点是什么？众声喧嚣，微妙的道理反而被盖过而显得悄然无声了。

诚然，在信息量大，流动快的互联网时代，微博，博客使发表言论成了很轻易的事情，私人领域言论和公共领域言论不可避免地混杂在一起。 但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因为言论平台的社交性质，而妥协参与公共讨论中言论的质量，是可以接受的吗？哈马贝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到：“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是相对立的，有些时候，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在社会自组织发育不完全的情况下，互联网所提供的公共空间使人们有机会练



习议事、辩论、达成共识。社交平台并不必然意味着可以随心所欲说话，言论自由亦是有边界的，而当我们在谈公共议事的时候，个人要对公共言论负责。话语权越大，在公共讨论中的发言越需谨慎，比如此次香港奶粉事件，就有一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导了问题，把单纯的奶粉问题泛化为中港矛盾。先入为主的认为这是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没有去了解事情的始末和法例实施的尺度，就用不属实的信息挑起了争端。他们应该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调解中港之间的张力，把事件的真正内涵揭露出来，而不是停留在口头的谩骂上，使得中港两地撕裂。

政治、经济和道德的判断更多是出于群集心理和群集反应，而不是冷静判断的结果。社会等不及去发现绝对的真理，涉及到公共议题时，真相的相对性则更明显了。香港到底缺不缺奶粉？这个简单的问题，在不同的视角下有不同种呈现的方式。奶粉供货商说，奶粉源充足；香港的父母说，某几个牌子一直断货。而问到政府是否应该干预，通过何种方式，干预多久，答案则更是因人而异了。有人因此觉得公共讨论是虚无的，背后只是不同利益团体价值观念的体现。不可否认，我们都是用各自的论证支持或是反对某种立场，在这些讨论之中，我们的主张必定会有互相冲突的时候，但这不要紧。公共讨论就是促成一个能够得到各种不同甚至互相冲突的广泛认可，只要这种认可符合理性的就可以。比如，我们可以讨论为什么那几个销量最好，总是断货的奶粉供给跟不上；政府为什么没有采用其他选项而唯独用了这一手段；此次的新规对香港、对大陆有哪些潜在的影响；是否是长期政策，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撤销。提出观点，摆出论据，这才是理性的公共言论。情绪化是人类的通性，而学会用理性论辩去锻造激情，克服自己的弱点，不仅需要智慧，需要时间，也需要练习。

仔细回想，这样缺乏说理空间的公共讨论习惯，我们并不陌生。那些年网络上轰轰烈烈的药加鑫是否应该判死刑，活熊取胆汁道德吗，钓鱼岛是不是中国的这些曾经轰轰烈烈的公共讨论，似乎都是以这样的方式展开、结束的。

而回看现在。你觉得对杀人嫌疑犯施加死刑正义吗？你如何看待你与动物的关系？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战略意义如何？怎么提一个好问题？怎样和人辩论？这些问题似乎我们都没有想清楚，而且永远有思考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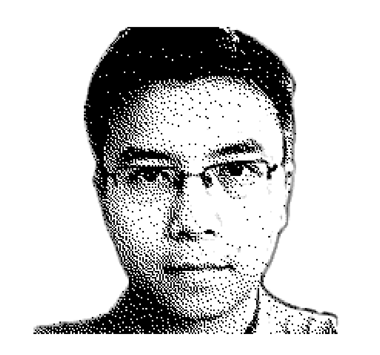
公共言论是社会智慧的产物，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的。

【返回目录】



# 【选举×民主】

## 一个政府工作人员的自白：香港选举如何进行？



Stephen Ho ：香港公务员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2012 年 9 月 9 日，被铺天盖地的选举广告轰炸得体无完肤的香港，又迎来了一次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站离家不远，但在途中倒是被漫山遍野的旗帜和选举宣传海报震慑了一把。到了离票站不远的街口，密密麻麻的选举广告忽然消失了，摇旗呐喊的候选团们也仿似踩着隐形的界线一般，不敢有一点靠近票站。

票站是个志愿团体的社区活动中心，平时主要举办幼儿活动，今天摇身一变成为了供小区内几千名选民投票的地点。中心门口上方悬挂着鲜黄色的横额，标示出“立法会选举投票站”。我早上 8 点多已经抵达了票站，可是前面已经排起了等候投票的人龙。进入票站之后，工作人员指示我根据自己的身份证编号去相应的领票处取得选票。我进入用塑料板和布帘临时搭建的投票间，用票站提供的印章在心仪的候选人名字旁边盖上一个 √，出来后把对折的选票放入投票箱内，然后就跟着地上贴着的箭头指示，离开了票站。算上等候之间，整个投票过程不到十分钟。

作为普通市民投票很简单，但是选举工程远远不像投票如此简单明快，相关筹备工作至少在选举日的三年多以前就要展开。放下宏大的政治命题，抛开选举制度的是与非，笔者作为参与了香港立法会选举工作的公务员，希望从选举工程的角度介绍我所参与的香港政府选举的筹备工作。

香港立法会现由 70 名议员组成，35 名议员由地方选区直接选举产生，35 名议员由功能组别选举产生。一般市民有资格投票的是地方选区和新增的区议会（第二）功能界



别。由于其他功能界别议员的产生办法比较特殊，普通大众较难参与其中，所以本文将以 2012 年立法会选举为背景，集中介绍地方选区的选举安排。

**选举法例和选举指引的修订**

香港社会的核心价值是法治，无论政府还是个人都以遵守法律作为行事的前提。而这点也反映在立法会选举中。虽然香港立法会的直接选举在 1991 年已经展开，但之后的每次选举都需要因时制宜修订相关法律文件。政府在 2009 年底已经就 2012 年 9 月 9 日的选举办法举行公众咨询，咨询期完结后政府在 2010 年 6 月正式提出修订立法会产生办法的法律草案，交由立法会审议通过。其后政府分别三度提交了进一步的法律修订文件，为 2012 年的立法会选举设定了基本的法律框架。

当法律文件生效后，随之需要处理的是选举指引的修订，这本厚达 371 页的指引详细列出了和立法会选举有关的事宜，候选人提名程序、投票安排、选举广告、竞选活动、学校参与、选举开支等等。这份指引的修订同样咨询了公众，并在 2012 年 6 月发表定稿，上载网站供市民查阅。

**五个地方选区**

香港全境被分为五个地方选区，分别为香港岛、九龙东、九龙西、新界西和新界东。这些选区的分界会视乎人口的变化和社会的变迁而更动。选举管理委员会在 2011 年 6 月向公众咨询选区划界和每个选区产生的议席数目，并于 2012 年 2 月发布了最终版本的选区分界地图供市民参考。

**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

并不是所有香港市民都有权参与立法会选举，只有在选民登记册记载了的人士才有资格投票。简单而言，只有年满 18 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并且通常在香港居住，才可以登记为选民。为了推广选民登记，政府在 2012 年 3 月至 5 月期间推出了覆盖全港的选民登记运动，并通过各种渠道宣传，包括电视、电台、报章、交通工具广告、演唱会、彩旗、横幅等。还在人流密集的地点设立选民登记站，方便路人随时凭身份证登记。

在 2011 年香港区议会选举中曾经揭发了不少“种票”个案，有候选人为了增加自己的胜算，而把居住在其他地区的支持者登记在自己所在选举的地址上，因采取的手法拙劣而被传媒揭发。例如二十多个互不认识的人登记的地址是同一个单位，或者盗用陌生人的地址进行登记。因此 2012 年的选民登记格外小心，选委会采取了多项措施避免事件重演，例如随机抽查登记选民、查核不完整地址登记等。



**候选人提名**

为参与 2012 年 9 月的立法会选举，候选人需要在 2012 年 7 月份内提交载有至少 100 名合资格选民签名的提名表。这些提名表需要经过由选委会委任的选举主任审阅并证实有效。

**550 个票站和 23,000 名工作人员**

2012 年选民登记册的选民数目大约为 340 万人，而当天投票的人数大约为 180 万人。为服务选民，香港共提供了 550 个票站，而运营这些票站的工作人员则全部都是在 2012 年 6 月期间，从现任的公务员团队里招聘而来。选举事务处一共聘请了近 23,000 名各级工作人员参与票站工作。为确保选举的公正廉洁，这些受委聘的人员需要声明自己和任何候选人都没有密切关系。

由于这些工作人员平常并不从事选举相关的工作，所以充足的培训相当重要，选举事务处分别为较高级的票站正副主任和普通工作人员举行简介会，并提供模拟票站让工作人员尝试届时将会担任的职务。政府还会向较高级别的选举工作人员发放厚达 400 页的操作手册，详细列出选举当日的一切工作流程。

**投票场地**

为了促进选民的投票意欲，选举事务处会尽可能选择选区内容易前往的地点作为票站，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地点也需要备有无障碍通道，方便行动不便的市民进出。但如果票站的选址牵涉私人场地，业主有权拒绝政府的请求。不过一般而言业主乐意借出场地，一则实践公民责任，二则租借场地还可以拿到租借费用。

立法会选举增设了监狱票站，在囚人士也可以投票，连选举当日被拘捕的人士也可以投票。

**大规模的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是立法会选举的重点工作，同时也是公众最直接接触的活动。从 2012 年 7 月开始到选举当日，政府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包括广告、互联网短片、巡游、智能手机应用程序、纪念品、集会等等。

候选人悬挂的横幅和张贴的海报可以在政府指定的展示位置或私人地方的展示位置展出。分别在于前者是政府统一编配，并以抽签方式决定候选人分到选区内哪个位置。而后者是候选人自行向私人地方的业主申请，并取得书面同意。票站外一定的范围会被划为禁止拉票区，在这个区域内严禁进行各种拉票活动，包括张贴竞选海报、口头拉票，甚至穿着和某候选人编号相同的衣物也会被视为违反规定。



选举事务处也会将载有候选人姓名、照片政纲等资料的候选人简介邮寄给选民，以提供充分资料让选民作出判断。随之寄出的还有投票通知卡、投票程序、投票站位置以及廉政公署关于选举的宣传单张。

**票站准备**

投票站主任和工作人员需要在投票日前一天到达投票场地将其改装成符合法律规定的票站。改装工作包括设置电话、传真机，准备票箱、在票站范围外用胶带画出禁止停留区等等。完成改装工作之后还会进行最终彩排，以确保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自己的工作。

**选举当日的指挥工作**

选举事务处在选举当日设立了中央指挥中心，该处全体核心成员均留守指挥中心以便沟通和统筹。这个中心包括监督投票进行的指挥台、支援票站工作人员的支援服务台、解答公众及执法机构查询的热线以及统计整理各票站提交的统计数字的部门。

而在各个地区层面，由各区民政事务处组建的地区指挥中心在投票前一日启用，这个中心的职责包括处理电话投诉、巡视票站、为票站主任提供法律意见、投票结束后接收票箱和后勤协助等。

**当日投票**

选民只可以在他被编配的票站投票。投票开始前 15 分钟，投票站主任会在候选人或其代理人面前展示空的票箱，然后为其加上锁和封条。

选民到达票站后需出示身份证，工作人员会核对选民登记册上的资料以确定选民的身份以及是否可以于该票站投票。随后工作人员会发出选票、√号印章以及辨别选民拿取选票数量的不同颜色的纸板。选民需在投票间内盖印，对折选票后投入投票箱内，以及将印章及纸板交回工作人员。之后需立即离开票站。

**监督点票**

立法会选举完结后，投票站会立即关闭，大多数票站变装成为点票站，而候选人和他委任的代理人可以留在投票站内监察改装的过程。而改装完毕之后，公众和传媒可以入场观察点票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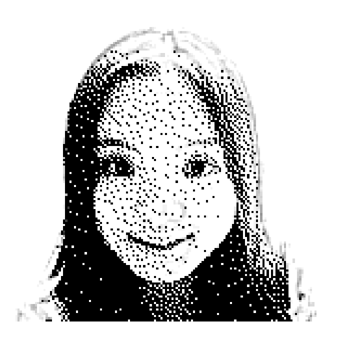
选举工程在任何地方都是重大的议题，而作为政府如何实际操作选举倒鲜有人介绍。这些细节或许繁琐，但这些它们却是民主社会能畅顺运作必不可少的齿轮。

【返回目录】



# 【选举×中国特色】

## 民主选举从登记选民开始



刘犇：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作为一名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选票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民主选举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在 2011 年，北京朝阳区人大的换届选举中，独立参选人柳红在所在的安慧东里选区只得了 100 多票，就这，已经十分不易。

在 2011 年中国县乡人大换届选举中，全国各地涌现了一批独立参选人，柳红就是其中一位。而在这之前，她未曾关心过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只是上半年，江西等地独立参选人的事迹在媒体和微博上广为传播，触动和唤起了她要去践行公民责任的意识，她决定独立参选北京市朝阳区人大代表。

**“扫楼”的遭遇**

柳红花了两天的时间，通过微博征集到了一些志愿者，有学生、工作人士、自由职业者、退休人士。为了让大家知道柳红参选，他们设计了宣传页：一面是柳红写给街坊邻居们的信，她承诺当选为代表后会倾听；代言；为大家争取权益不懈努力。为了拉近距离，她用的是手写；另一面是她的自我介绍：学者，自由撰稿人，丧子妈妈，热爱长跑、瑜伽，奉行素食……她这样的介绍，是为了让街坊邻居们能够看到他们与她的共同点，因为这样而走进她。

柳红说，基层的民主不是讲大道理，首先是让人们接受你。



选区里，一位是书法协会会长的老先生看到柳红手写的致街坊邻居，给她打电话，表示支持。老先生不仅自己支持，他还在社区大院下棋时，告诉那些棋友们，要选柳红。

因为写道奉行素食，关心健康，做安利营养产品销售的一对夫妇也主动联络柳红，和她交流保持健康心得。他们在之后为柳红游说争取选民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

设计好了宣传页，印了一万份，先后有 20 位志愿者参与“扫楼”，也就是在小区居民楼里面，张贴和发放柳红的宣传资料，并且挨家挨户上门宣传，请大家支持柳红。

扫楼宣传，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对方一般不开门，会先在门内问：“谁呀？什么事？”“您好，打扰一下，您关注最近区人大代表选举的事了吗”，然后就是一阵沉默，对方不理会或者匆匆拒绝。为选举扫楼，在中国是极少见的事情。而志愿者们，不死心。

有一次敲门后，一位先生开了门，他神态淡漠、戒备，甚至有几分不耐。志愿者问他是否关注选举，他说：“我对这事不感兴趣”。志愿者耐心跟他说能理解，说自己以前和他一样也是没有兴趣，但大家的选票已经荒废得太久，而且今年和过去有些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这位先生马上问道，表情少了些淡漠。志愿者就从非京籍的外地人可以参选，转而说到柳红的非政党、非人民团体身份，来自民间等等。这些话，这位先生比较能听得进去，他对志愿者说会细看材料。当志愿者提醒他及时去登记选民身份，并希望他支持柳红时，这位先生基本答应，脸上也已多云转晴……

这样小小的胜利，让常常遭到拒绝，受到冷漠的志愿者激动不已。

一位志愿者在日记中写到：

“半天中，大约拜访了近 200 户居民，约 6 成家中无人，其余大多数还是愿意开门和交谈，但也有拒绝的。但是大多数的人即便听过我的介绍，仍然很茫然，不知道到底什么来意，要自己做什么。有的居民会强烈地表示不登记，他们觉得，选了有何用，不过只走过场，所以用不参选来抵制。有的以为是现在就需要选择；有的以为是这次就只能选柳红；有的并不知道年满 18 岁公民都有投票选举权；当然更多的虽然知道选举，却不知道如今可以有独立参选人参选，而非千篇一律的走形式，走过场”。

一位四五十岁的阿姨，听了志愿者对柳红的介绍，很是感慨地说：“当官的哪里在乎我们，他们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是可以选老百姓，我肯定去登记，肯定选老百姓。”



除了志愿者的扫楼计划，柳红为了尽可能多接触选民，让对方了解自己，了解选举，她早上去跑步，她每天把选区内能够跑步的地方都去跑一遍，见到锻炼的、跳舞的、下棋的居民，都会向大家做自我介绍，告诉别人她正在参选以及这件事的意义。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今天去安慧东里居委会登记选民，居然还需要排队，连居委会的人都说从来没有过。

不过柳红的宣传才进行了 5 天，她就被居委会、被街道选举办找去谈话。他们不许她再继续发资料、自我介绍，甚至不要与人接触。为了之后的参选着想，柳红只好尊重他们要求，停止了社区内的宣传。

**被协商，成为"另选他人"**

在成为候选人之前，必须要得到选民小组的提名。选区内每栋楼有一个选民小组。柳红所住的楼有 1000 多人，选民只登记了 36 个。

当天的选民小组会议，由居委会指定的小组长主持，社区居委会书记说是列席，实际上主导。参加者只有柳红，5 位柳红的支持者，一个单位代表和一位年老体弱的居民。散会后，有人问书记："这次发不发东西啊？""上次都发了的。"其余近 30 名登记选民并没有来参加选民小组会。要么不关心，要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开会，没看到通知。

在其他几位志愿者的帮助下，柳红获得超过 10 位选民的推荐，成为了初步候选人。初步候选人一共有三位。而正式的候选人，也就是名字能出现在投票单上面的，只能有两位。如何从三位中选出两位，成为正式候选人，《选举法》规定的是要协商讨论产生。柳红很快就被"协商"出局了。不知道是如何地协商讨论，她去询问，对方回答，没有标准。

不能成为正式候选人，就只能变成"另选他人"了。在人大代表选举中，选票上设有"另选他人"一栏。也就是说，支持柳红的人可以在投票时在该栏写上柳红的名字。

因为被限制宣传，志愿者们又为她作了一个几分钟的视频，放在网上，告诉人们为什么参选很重要，怎么另选他人。

宣传被限制，对于能否当选有很大的影响。有的选民在投票时，还写错了柳红的名字，这被视为废票。

**从登记选民开始**

安慧东里选区里，登记了选民的居民人数只有常住人口的 1/10。



柳红说，如果大家都登记，就可以投反对票，也可以不投票，还可以另选他人，总之比不登记强。

虽然选举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比如非京籍选民登记手续复杂，协商讨论定义模糊等问题。但是选举法也在修改，比如可以让非京籍的外地人投票，规定候选人和选民见面，以及启动预选机制等。

人大代表制度是否能够帮助实现民主还有待讨论。但选举并非是民主的全部。所谓民主，首先作为公民应该参与其中。常常听到有人在抱怨基层人大代表不负责，开会在睡觉。但是不管代表称职与否，都是由选民选出来。是否登记成为选民，投票还是不投票，这是公民的权利。当你放弃登记成为选民时，也就放弃了这个权利。其实，公民可以选择不睡觉的代表。

2011 年有 100 多位独立参选人参选，有人将此成为“独立参选运动”。独立参选人的出现，对发现选举制度中的问题，推动选举制度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结果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但这却是一次身体力行的选民教育。选民和参选者们在用行动实践公民社会，它让更多普通人了解到自己的权利，了解到每一个个体在社会中应承担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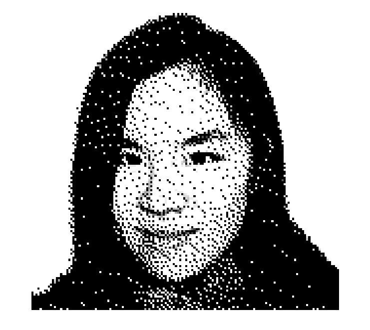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公民，在呼唤选举民主的时候，首先应该拿起手中的选民权利，从登记选民开始。选票不会自己跑到我们的手上，实现民主选举需要所有公民的争取与努力。

【返回目录】



# 【市场×理性】

## 市场中的人们真的在理性选择吗？



童亚琦：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 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当下中国，市场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缓冲地带里，最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尽管它的建立和发展在中国离不开政府行为，但市场一旦建立就有了独立于创建者的生命力，有了市场的规律、原则和道德。不仅如此，主要作为经济活动场域的市场也对参与者的心性、习惯甚至信仰做了些新的注解。“理性”几乎成了永不可能被推翻的注解之一。经济学家们指出：市场通过竞争机制要求人们必须理性。

汪丁丁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一文中指出：“一般说来，市场社会里各种经济制度的创设，总是由企业家们发起，然后由经济学家们加以‘理性化’阐释（有时需要理性化地修正），从而得以推广到其它地方。理性主义至今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信条。”市场理性有多个层面的涵义，汪丁丁列举了“人的自利性”、“极大化原则”和“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一致性的假设”。

经济学家 Richard McKenzie 更进一步援引实验证据表明，市场在激励人们做出较为理性的行为方面，要比其他方式靠谱。由于信息不完整、达不到做完美决策对智力极高的要求，大多数人并非完美的决策者。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失败。事实上，市场所做的要远比引导改善资源分配多得多，它能够让参与者比在其他环境下表现得更加理性，因为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付出代价。于是，市场要求（而不是允



许）经济学家们假设人们要比在实验室里更加理性，因为实验室里不存在有意义的信息、激励机制以及市场压力。

F.A.哈耶克在30年前出版的著作《法律，立法与自由》里很好地描述了市场与理性的关系：

“竞争……是一种引导我们获取知识和习得技能的方式。那些认为竞争是基于对参与其中的人的理性行为假设之上的人们不会理解这一点……虽然理性行为常常被认为是经济理论的前提，但这是错误的。经济理论的基本主张恰恰是说竞争使得人们为了谋生，必得理性行事。这套理论不是建立在“市场过程中的大多数或者全部的参与者都是理性的”这个假设上，相反，它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通过竞争，一些比较理性的人会胜出并成为其余人的榜样，后者会效仿和追赶前者以图获胜。社会中，个人由于理性行为而获益，理性的方法将不断发展并通过模仿而广为传播。假如人们不能从理性行为中得益，那么表现得比别人更加理性就毫无用处。“

如上所述，市场让参与者有无数练习理性思维、决定的机会。但尽管理性者在市场中胜出，人在离“理性”的理想型还向去甚远。以下几个例子及分析进一步说明，人是重喜好、价值的社会动物，而非理性机器。市场的确提供了理性思考的奖励机制，但是许多参与者在做某些决定时，不论是关于个人工作、生活的决定，还是追求社会正义，改变现状的决定，市场理性都不是起决定性的因素。这样的分析在市场理性渐渐形成，社会又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尤其令人深思。

假想你是个新鲜出炉的MBA，幸运地有四个可选择的工作。第一个给你提供高薪，但工作地点偏远，远离家人和朋友。第二个，薪水还过得去，但发展空间很大。第三个则给你提供一个看起来似乎很棒的工作环境，但是事业的发展机会相对则小一些。最后一个则是很有趣很有挑战性的工作，但工作时间很长。你会选择哪一个？更重要的是，你该选择哪一个？

按照经济理性的标准，作为一个理性地决策者，你会如何挑选工作？你会创建一个电子表格，将工作的相关变数包含在内（例如，薪水、同时、上升空间，工作地点等等）。接着，你会衡量各个变数之间的重要性（毕竟，不同的变数对于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然后，你会对各个工作的不同属性添加一个附加值（如，10分就很好，1分就很垃圾）。最后，基于这是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你所做的是对不同工作的一系列预测（你的同事可能并不像他们看起来这么好，公司可能在你有机会升职之前就玩完了，等等），你在衡量之前就该了解好不同工作属性的不同价值。现在，除了些乘乘



加加的算术过程，已经万事具备了。那么，数学帮你找到这个问题了答案了么——我该选择怎样的工作？

模型的理性选择产生了数个可能性。它假想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我们所做决定而产生的不同方面的结果也被假设是“可测量”的（即，用一个共同的量化单位来测量——“实用性”的量化单位）。同时还假想我们是在获得事件完整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定的，并且考虑到各个结果的可能性。

现在就我所知，几乎没有人是按照上面这个模型来选择工作的（或者是购买房子，去哪旅游，上哪所大学，买哪种车，或者其他的所有事情）。从这个事实我们学到的是：人是一种做次好决定的非完美理性生物。

整个名为“行为经济学”学科的发展，记录了人类不完美理性抉择的许多方面（“行为经济学”是个误称，因为该学科其实不过是把心理学应用于抉择，而抉择经常具有经济后果）。这个学科的奠基人之一，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Daniel Kahneman（丹尼尔·卡尼曼），最近出版了名为《思考的快与慢》的专著（Thinking fase and Slow）。很好地回顾了他 40 年来关于“做次好决定”的研究。书中涵盖了一系列的其他学者，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丹·阿雷利（Dan Ariely），甚至是我，这些都已经抓住了公众的眼球。

现代研究告诉我们我们在两个方面是非完美理性的。一个是我们错误的数学计算：我们并不擅长思考不确定的事情然后在脑海中创建相关的电子表格；第二个更为重要：我们想要的往往是错误的。我们错误地估计了结果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满足感和实用性。我们太过忽视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这样，吃和花得就会过多，而练习和保存得太少）。同时，我们也错误估计了做出一个决定会使我们满意多久。那样，我们就逐渐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会慢慢对好的事物审美疲劳，它们所带来的满意度也会随之减少（比我们想的要少）。

我们能够了解自身决策过程中的这些特点极为重要。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机构慢慢推进发展政策的实行，若不是强逼，市民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但要注意到：所有这些研究并未挑战“何为理性抉择”的规范性模型。

理性选择的模型当然很好，只不过人们却做不到。我想说，其实这个模型也不是那么好。基本上该模型中所有关于人类和世界的假设都大谬不然。

它假设人们都是自私的。好吧，不管对或错。自私确实是驱动我们前进的部分动力，但我们同样关注其他幸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国家，甚至是这个世界。我们同样关注做正确的事，甚至在没人注意到时也会考虑牺牲自我。



它假设具有一个价值的通用单位，世间所用事物均可用它来衡量比较。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的确，我们能用价值几何来衡量薪水、同事关系等等一切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物。但若这么做，我们相当于承认这些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通用的衡量体系来代表我们生活的幸福与否。决定当然并不好做，但却不能生搬硬套。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将决定进行不同的比较这么困难。

它假设我们能够将结果进行各种意义可能性的分析。可能有时候我们确实能这么做，但生活却并非可能性已经确定的轮盘赌博或反复抛硬币。世界绝对是充满不确定的地方。若我们总是将自己不确定的事物加以评估，这说明我们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这个至关重要，而非少数的技术问题，因为若你不能将所期待的可能性结果数值化，你便并不能计算从中获益多少。

我们应该对收入的不平等加以抗议，应对教育的不平等加以抱怨，应对金融机构的贪婪有所动作。而在经济理性的概念中，这些行为毫无一席之地，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超级理性的。既然经济学说话方式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政治机构的非官方“语言”，那么上述无人问津的行为，就会在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明显。若我们想要建设一个机会更多、更公平的社会，则需要一个比我们将从市场理性中获得的，更加宽泛的理性概念。

**本文由三篇文章整理而成：**

1. 人类的非理性——这对变得理性意味着啥（译者：丁半仙，原作者：Barry Schwartz）
原刊于：http://www.theeuropean-magazine.com/barry-schwartz--3/875-human-irrationality--2 ，
原文链接：http://select.yeeyan.org/view/360568/332799

2. 市场如何使我们更加理性（译者：zhouyuankim，原作者：Dya Somin）
原刊于 http://www.volokh.com/2010/01/06/how-markets-make-us-more-rational/，
原文链接：http://article.yeeyan.org/view/61610/76335）

3. 汪丁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
http://www.aisixiang.com/data/34727.html?page=1

【返回目录】



# 【教育×正义】

## 老师心里的兰花草



库斯克：香港中学通识教育老师，博客作者。

>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心目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为社会带来幸福和进步。

**从兰花草说起**

每个人心目中的教育是什么，或多或少受他们遇过的老师影响。当我还是中小学生的时候，印象中不少老师都是古道热肠、忧国忧民的。他们常常会跟我们说五四运动和八年抗战的故事，教导我们应该当一个有正义感、有道德、有承担的中国人。

我的老师有的是年少时见证过抗战和内战的人，有的是南来避秦的学者的学生。我想，他们身为知识分子，最痛苦的莫过于眼见国家沉沦，而且那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式。我是 80 年代念小学、90 年代念中学的那代人，沉沦的现在式，相信大家明白我在说什么。

还记得一位老师教我们改篇自胡适新诗《希望》的歌曲《兰花草》，歌词是这样的：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一日看三回 看得花时过

兰草却依然 苞也无一个

眼见秋天到 移兰入暖房

朝朝频顾惜 夜夜不能忘

但愿花开早 能将宿愿赏



满庭花簇簇 开得许多香

歌词中的兰花草，是民国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在中国开花结果的期望。这个迎接德先生的理想，是好几代中国人的梦想，可是每一代人都看着它含苞待放过，无数的人尝试用自己的血、泪，甚至性命来栽种兰花草，却没看得到它开花。

我们希望学生成为怎样的公民?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我心目中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健全人格的公民，为社会带来幸福和进步。现在香港的学校教授德育及公民教育，大致上就是以此为目的。我们在德育课程中教学生要诚实、有责任心、尊重别人、奉公守法，在公民教育课程中教学生认识普世价值、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恪尽公民义务，为的就是让学生成为一个有水平、能独立思考的公民。

学生自小学习帮助别人、见义勇为，大一点的学习投票、监察政府、为公义发声，当他们进入社会，便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希望学生会见义勇为，因为我们都有恻隐之心和慕义之心，不希望会有人见死不救，更不希望有人见到不公义而视之为等闲。我们希望学生会有捍卫自己权利的意识，因为在现今的香港，实在有太多人不断尝试夺去我们的公民权利，例如新闻自由、游行集会自由、普选的权利等。

如果学生进入社会之后变成娱乐至死的梳化薯仔（沙发土豆），又或者是犬儒主义者，当权者便能继续温水煮蛙。那样，本来已经不民主的社会将会更不民主、因为没有民主制度制衡而产生的官商勾结将会变得更明目张胆、本来已经有如风中之烛的人权和法治将会无以为继。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如果教育场景不能培养出良好公民，身为老师的，应该负一部份责任。

**为何反“国教”？**

可是，单是教是不够的，身为教师的，也有责任为学生争取一个更好的课程。2011 至 2012 年的反国民教育（反国教）风波，就是这样。

特区官员和亲北京的政客说，国民教育是天经地义，只要教得好就没有问题。如果香港是一个市民和政府有足够互信的社会，这是对的。问题是香港市民被北京政府和特区政府一次又一次欺骗（尤其是在一国两制和普选问题上），市民和政府之间已经欠缺基本的互信。结果，在国民教育这个涉及意识形态的大问题上，市民完全不相信政府不会以此作为潜移默化的维稳教育工具。



因为对手从来都不可信，所以人们才会用放大镜检视课程文件及政府的示范教材的细节，找出当中与中国大陆的思想政治课相呼应的地方（例如党国不分、鼓吹国家图腾崇拜等），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令“反国教”运动一呼百应。

“反国教”运动演变成上万人长期占领政府总部广场的运动，迫令政府最终宣布课程无效，除了因为政府与市民之间不信任和课程内容瓜田李下，很大程度上亦拜香港政府和本地亲北京组织（俗称“土共”）的极左思维所赐。胡温提过香港要加强国民教育，于是特区政府便大干快上，置民意、学者、教育界的质疑不顾，摆出一副政治任务寸步不让的姿态，加上土共利用公帑制作极左教材之余，还要摆出一副阶级斗争的嘴脸，结果令民意发酵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苞也无一个**

身为教师的，有谁不想学生将来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有谁不想透过教育令社会变得更公平、更正义、更幸福？眼见北方社会矛盾日深、民变此起彼落、贪腐无日无之、黑金二代蜂拥涌外流、二十年来政改无望；而自己的家园则温水煮蛙、人权法治等核心价值逐渐被蚕食、说好的普选遥遥无期。不禁想起儿时老师教我的《兰花草》：兰草却依然，苞也无一个……

一代又一代希望幻灭，这是何等的可悲。我唯一的期望，是不要出现路易十六式的崩溃。台湾的朋友见得到兰花草开花，但愿彼岸这边也做得到。

【返回目录】



# 【教育×中国特色】

## “特色”惹的祸
## ——法律视野下的中国特色教育



冉夷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现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法学院。

“由于国家将教育视为更好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途径，教育本身自然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而仅有工具性价值。由于国家将教育的核心目标，并非放在‘培育健全人’与‘培育现代公民’之上，而是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上，‘教育’自然在原初状态时就已然变味。”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标语恐怕并不陌生。不过，吊诡的是，在这个宣称“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的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国度，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1]。在这个高喊“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主张推行“素质教育”的国度，教育领域的问题却层出不穷、教育改革艰难迟缓。通往现代教育的道路，似乎荆棘丛生、步履蹒跚。反思今天的中国教育，其“特色”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又会引领我们走向何方？

如果我们相信，法律是立法者的创造物，那么创造者的意图必将成为理解与适用法律的指针。对于立法而言，明示“立法意图”，不仅可以有效地进行“立场宣示”，还可以有效左右法律规范的基本走向，从而确保法律实现立法目标。 或许，我们不妨从这个角度切入，更好地理解当今中国教育的“特色”之处。

---

[1]根据温家宝总理 2013 年 3 月 5 日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3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3_03/05/22751846_0.shtml（蒙特利尔时间 2013-3-4 晚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开宗明义，“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然而，翻开台湾地区“教育基本法”，其立法意图是，“为保障人民学习及受教育之权利，确立教育基本方针，健全教育体制，特制定本法。”

根据《宪法》规定，“受教育”对于大陆人而言，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谓权利是指，国家通过积极作为，落实对公民的承诺，保障公民享有教育权利。与此同时，在根本制度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成为了教育的核心目标。所以，教育在根本上要为社会主义服务，要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3 条所示，“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使适龄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奠定基础。”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 4 条所示，“高等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称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然而，对于台湾人而言，“受教育”是“权利”。 “教育基本法”第 2 条明确地传递出，台湾的立法者对于“教育本旨”的认识：“人民为教育权之主体。教育之目的以培养人民健全人格、民主素养、法治观念、人文涵养、强健体魄及思考、判断与创造能力，并促进其对基本人权之尊重、生态环境之保护及对不同国家、族群、性别、宗教、文化之了解与关怀，使其成为具有国家意识与国际视野之现代化国民。”由此可见，台湾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育健全人、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

对于教育本旨的不同理解，自然决定了两岸对于教育的制度设计、政策安排的明显差异。台湾“教育基本法”第 2 条确立的“人民为教育权之主体”的原则，看似无可咀嚼，实则掷地有声、意义非凡。因为，在威权体制下，教育是一项被国家捆绑的活动，国家确立一种思想作为教育的基础思想，并将国家自身视为教育权的主体，向国民灌输国家认为正确的思想。而确立“人民”作为教育权的“主体”，实际上是，国家一方面通过积极作为保护人民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充分尊重人民在教育事务上的权利，特别是尊重“学术自由”“教师自主”“身体自主与人格发展”等等。

反观大陆，“健全人”与“现代公民”并未占据教育的核心位置。这一点无疑与现代文明的要求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类开始反思自身行为与观念，强调“人权”观念。



在《世界人权宣言》第 26 条第 2 项针对“教育”有如下阐述：“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教育应促进各国、各种族或各宗教集团间的了解、容忍和友谊，并应促进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各项互动。”中国是《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早在 2004 年亦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文写入宪法，如何在教育领域，进一步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要求，让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成为中国教育的根本点，确实需要进一步地行动。

由于国家将教育视为更好服务“社会主义事业”的途径，教育本身自然并不具有“内在价值”，而仅有工具性价值。由于国家将教育的核心目标，并非放在“培育健全人”与“培育现代公民”之上，而是放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之上，“教育”自然在原初状态时就已然变味。

然而，变了味的教育，却吊诡的成为了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样的“特色”，经过若干年的实践，似乎并没有让我们舔尝幸福的滋味。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苦恼与疑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为什么我们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为什么努力‘减负’，推行素质教育，却效果不佳？”“为什么用‘最崇高’的道德教化、‘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却依旧无力扭转学界的道德滑坡？”

习近平总书记在履新讲话时说，“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然而，如果我们不对变了味的“特色”做出修改，如果我们忘记了马克思曾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如果我们不赋予“教育”以“内在价值”，一切有关教育的改革就只可能在小修小补中，依旧步履蹒跚。

【返回目录】

# 【教育×理想】

## 寻找关联——博雅教育的目标



作者：William Cronon，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地理、环境研究教授。

> “受过博雅教育意味着一个人能发现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并因此生活的游刃有余。我所描述的每一种品质、倾听、阅读、交谈、写作、解谜、追寻真理，了解他人，领导和合作都为了寻找关联。博雅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一个人从中获得力量、智慧、优雅和自由，最终达到世界万物相连相生的境界。”

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像今天这样无数学院和大学都把“博雅教育”这个老套的词作为教育宗旨挂在嘴边，这个问题显得再简单不过。从高中生们信箱里塞满了的大学招生的小册子一直到进入大学后的动员大会，这个概念被重复了无数遍。难怪这个概念显得越来越空洞抽象，大学生也逐渐只把它当做学校招生的宣传口号和陈词滥调。然而很多人还和我一样仍然对这个词寄予厚望，并且相信这始终是所有学府最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那么博雅教育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始终追求它？

当我们谈到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们并不是指某种政治概念上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至少不是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一种热衷于培育自由人格的教育传统。如今 liberal——“博雅的，自由的”和 liberty——“自由解放”总是伴随着很多争议，作为一个极端的政治概念，它们不是被支持就是被反对。除了耳熟能详的政治口号，我们好像不知道还可以在哪里见到过它们，但它们的确和博雅教育密不可分。Liberal——“有教养的，文理的，自由的”，起源于拉丁文 liberalis，意思是“与自由艺术有关的”，这个词又来源于另一个拉丁词根“liber”，意为“自由的”。实际上这个词还有更深远的源头，先是古英语的“leodan”意为成长，然后是



“leod”也就是“人”。它也和希腊语的“eleutheros”有关，其意为“自由”，接着最终的源头是梵语“rodhati”——“行走生长的人”。自由和成长也就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博雅教育”的核心。

博雅教育是建立在这样的价值观上的：它相信一个人的进步和成长是为实现个人的自由服务的。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如果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是通过博雅教育发掘和施展个人天赋，最终实现个人精神上的自由，那么什么样的教育才是一种能够实现人类自由的教育呢？难的地方就在这。为了在书本课堂和教育体系中体现“自由”和“成长”这样抽象的概念，很多针对教育方针的争论应运而生。我们应该强制要求学生学习美国历史吗？如果要，那这门课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应该强制学生学习第二外语吗？要了解实验科学吗？要掌握微积分吗？要以牺牲创造性思维为代价学习枯燥的语法吗（还是反过来）？应该熟读柏拉图，莎士比亚或马克思，达尔文吗？应该要求他们上那些能消除民族或种族偏见的课吗？即使我们都同意自由和成长的重要，但通过什么样的课程设置来实现这些目标仍引起广泛的争议。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讨论教育的时候常常花更多的时间谈核心价值观，而不是具体的设置，例如什么样的科目才能让年轻人们真正成为受过教育的成年人。

这个问题就更难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拿是一串串的清单来作为答案，这尤其能从E.D.赫希的《文化遗产》和上千所大学的课程目录里看得出来：必修课的清单，阅读清单，重点清单，上百部二十世纪英文小说列表，等等等等。创作这些清单其实就是博雅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它的前身就是中世纪的古典教育，那时候一个学生必须学习某些课程才能成为“自由的人”。那时候的“博雅教育”有很明确的要求：总共有七个科目，其中分为三门基础学科和四门高级学科。三学科（trivium）包括文法，逻辑和修辞；四学科（quadrivium）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一个人只有完成这些科目才算是自由人（free man）。这里我们也要留意当时的教育存在严重的阶级和性别歧视。享受这些教育的自由人（free men）都是男性贵族。这些知识也成为了用来分辨自由人和非自由人（奴隶和贫农或其他普通老百姓）的准绳。我们现代的博雅教育在中世纪的基础上拓展了学科的范围，容纳了更多有才能的人，同时争取让更多人都有机会能享受到这种为人类自由服务的教育体制。

然而为了试图弄清楚这个教育体制的模样，我们还是得列列清单。我们已不再开办中世纪大学的七门学科，也不再认为学习希腊语或拉丁语就等于受过教育。但我们的确提供了更多其他的课程，并且试图把这些课程和教育方针结合起来以实现所谓的博雅教育。每个学校的教育方针都有可能不同，但有些东西是不变的。无论他们的课表或学分算法看起来多么复杂，尽管有时候复杂的令人发指，大部分学校都要求学生每学



期修够一定的学分，一组基础课，至少一门微积分预备课，一门第二外语；学生必须略懂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接下来就是专业要求的课。

当然，我们早就远离中世纪古典教育的时代了，但我还是担心我们会在这么多要求和标准迷失我们的最终目的——博雅教育。无论这些教务委员会的人怎么精心设计这些课程，我们可能还是不清楚博雅教育体系里的这些标准到底和个人自由有什么联系。

当我们试图解释设置这些标准的原因是，竟感到有点语无伦次。比如说，我熟知的一所学府就列出他们“博雅教育的目标”是：（1）良好的沟通能力；（2）灵活运用多种思维角度；（3 对各科知识的一定了解；（4）对至少一个专业的掌握。这明显是只有教务处才用的陈述，我觉得这实际上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兴趣。

但问题是比起具体描述一个受过类似教育的人应有的品质，把其中的课程要求列出来似乎要简单的多。那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必修课程恐怕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博雅教育，因为在我们列出种种要求的同时，学生们已经某种意义上失去了“自由“。

于是我只好回到我最初的问题，并试着借助清单去解答它（还是清单比较实在）。但我列的不是必修课的清单，而是个人品质的清单：十种来自我敬仰的，并能体现博雅教育价值观的人身上的品质。那么怎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呢？

**1.他们懂得倾听。**

这看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但在这个或三心二意或过度忙碌的年代，我认为十分有必要重申一下有教养的人懂得如何倾听他们身边的人和世界。他们很认真的倾听别人说的话。他们能抓住论点，跟随推理，发现谬误，感受隐藏在逻辑或荒谬背后的情感，并最终与产生这些情感的人感同身受。

**2.他们阅读并理解。**

尤其是在这个有无数种阅读方式的世界里，这也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但有教养的人能同时欣赏《时代周刊》的头条新闻和其中的艺术、体育、商业、科学和评论版。他们能同时读《美国学者》、《纽约书评》、《科学美国》、《经济学人》、《国民咨询》（某八卦杂志——译者注）、《VOGUE》和《读者文摘》。他们能同时享受约翰·米尔顿（18 世纪英国诗人）和约翰·格里舍姆（美国推理惊悚小说家）的作品。老练的读者看到的远不止文字和语言。他们因看到艺术博物馆里的精品或听到音乐厅里的旋律而感动。他们还看得懂各种各样的体育竞技。他们同时被古典和当代的戏曲电影吸引。他们能从电视里窥见现下的潮流。当他们在森林里，实地或沙漠中漫步，他们能辨识野生动物或分析脚下的土层。他们瞥见远远的农田，并马上分出哪些是豆



子哪些是紫苜蓿。他们能告诉你这件艺术品是出自精工之手还是机动车间。他们也晓得畅游因特网。上面列的都是能把眼睛和耳朵调动起来，充分感受人类文明的方式。或许没有人能真的掌握所有这些“阅读”方式，但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应该能做到以上的某几种并对剩下的方式总是充满好奇。

**3.他们能和所有人交谈。**

有教养的人会说话。他们会演讲，会问问题，还能逗乐听众。他们能和中途辍学的人或诺贝尔得奖者，小孩或老人，工人或CEO自如地交谈。更重要的是，他们之所以愿意和这些人交谈不是为了谈论自己，而是真心地想要了解他人。我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父亲教会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去发现为啥那个人就这么牛”。我实在是想不到什么能超越这句话的表达了。

**4.他们能书写清晰明了和动人心弦的篇章。**

能说能写同样重要：有教养的人知道怎么码字。我不是在指分析句子和段落，而是怎么样通过表达他们的思考和心得来教育，说服或感动读者。我把写作比作一种触动，就好比激动的对话所产生的触动。

**5.他们能解各种各样的谜题。**

揭开谜团需要很多技巧，包括对数字的敏感和对电脑的熟悉，还有就是相信任何抽象的现实都能转变成具体的分析。这些是分析师，管理者，工程师和评论家拥有的技巧：一种擅于分解看似复杂的表象，并捋清楚表象的背后与现实的关系的能力。这其中的挑战就在于如何把分解后的“零件”重新组合，嵌入现实。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逐渐且实际地改变我们想要改变的现实。

**6.他们不是为了努力而努力，而是为了追寻真理而努力。**

真正有教养的人热爱学习，但他们更爱智慧。他们会欣赏有力的论证，但不对严密的逻辑常怀于胸。他们明白知识是为意义服务的，于此同时他们努力把这两者结合在日常的对话中。所有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培养一种能逐渐领悟“为什么努力”的意识。但如果这种意识不是为更远大的志向服务，它就变得无用。

**7.他们能做到谦卑，宽容和自我批判。**

换句话来说，他们能了解和体谅别人或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他们有足够的智慧和胸怀跳出自己的经验和偏见，并因此欢迎所有异己的观点。这一点正好与博雅教育反对人做井底之蛙，鼓励人拥抱世界的观点遥相呼应：学习另外一种语言，了解世界另一个



角落的文化，探索历史长河里的故事。假如没有这些交际，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大差异，也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有多么相似。

**8.他们会脚踏实地地做事。**

西赛尔·罗兹(Cecil Rhodes)在谈他设立的罗兹奖学金时说到，他要寻找的是那些能把一生贡献在“与世界做斗争”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些致力于改变当下世界的人。能实实在在的做些什么来影响世界是博雅教育当中最实际最重要的一课。诚然，在这个世界四处都是滥用权力的诱惑，但这并不是我们不去行动，不去影响，不去和世界做斗争的借口。我们就是要学习权力，并最终驾驭它。

**9.他们回馈社会。**

只有团结集体的力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正面的影响力。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很清楚，他们生长社会的好坏直接影响他们自身，因此他们通过帮助别人成功使社会变得繁荣富强。如果我们认同博雅教育是为自由服务的，那么博雅教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意识到只有一个自由的社会才能塑造自由的人。社会和个人相互依存。理想的实现，正确的行使权力，对多样性的热爱，等等都离不开一种相信个人成功实际等于社会成功的理念。

**10.他们就像E.M.福斯特在《霍华德庄园》中说的那样：“寻找关联…”。**

最后，受过博雅教育意味着一个人能发现这个世界里各种各样的关系，并因此生活的游刃有余。我所描述的每一种品质、倾听、阅读、交谈、写作、解谜、追寻真理，了解他人，领导和合作都为了寻找关联。博雅教育的本质是引导一个人从中获得力量、智慧、优雅和自由，最终达到世界万物相连相生的境界。

我认为我们应该好好检查一下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看看我们是否有在成功地教育小孩或年轻人去追求这些品德。我认为我们还要通过检查我们自身和这个社会来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培养和实现这些品德。

我还要附上两条注意事项。第一就是我原来的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受过博雅教育的人”其实是很容易误导人的。因为有的人会以为只要上了某些课，攒了一定的学分，或者完成了强制的学习指标就真的等于受过博雅教育了。这还差的远呢！博雅教育从来都不是什么我们能完成的，它并不是一个过程，而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尽管可能迟钝但也不放弃摸索真理的态度，一种引导我们领悟教育是永远也不会终结的态度。



我的第二条注意事项和个人主义有关。如果你觉得教育就是让个人从教学中获益，这也难怪。我提到的始终品德都来自不同的人身上。我也说过博雅教育最关键的就是要培养个人自由——帮助年轻人发现并发挥他们的才干。这些听起来都仿佛印证了教育就是为个人服务的本质。

光这两样就足够误导人了。为个人自由服务的教育当然也是为社会自由服务的，这两者必定相互依存。我所提到的每一样品德都是一种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自如地运用力量和智慧的方式或技巧。如果我说的没错，所有的品质最终都是为了寻找联系，那我们似乎又碰到一个谬论。在我们追寻自由的同时，我们也被赋予我们自由的社会束缚住了。也就是我们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变成了一种约束。我们追寻自由的同时，已不仅仅是在改变自己，还要改变我们身边的世界。

于是我又不得不回到E.M.福斯特的那两个词“寻找关联”。这是目前为止我所能找到对“什么样的人是受过博雅教育的人”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他们更完美地描述了这个世界上最无私最强烈的人际关系——爱。我并不是指那些浪漫热情的恋爱，而是所有宗教信仰的核心都强调的爱：不是恋爱，而是博爱。博雅教育是为人类社会服务并培养个人自由的教育，其核心也是为了宣扬爱。无论我们现在谈学校还是谈自己，我们都牢牢地记住这意味深长的两个词，“寻找关联”。

*博雅教育也称文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美国教育界的一种通识教育体系。译者选择“博雅”代替一般常见的“文理”是因为文理总是让人想起中国的大文大理，和英语的liberal（自由广博）的联系不够紧密，博雅的发音和liberal比文理要更靠近，意思也显得比文理要宽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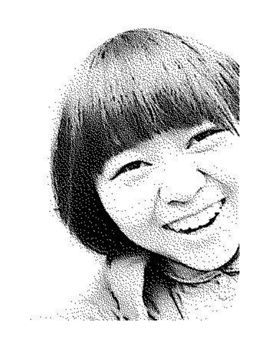
（原文链接： http://www.housing.wisc.edu/docs/reslife/lc/crc/crc-only-connect.pdf。翻译：缪思，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新闻与大众传媒专业本科生。）

【返回目录】



# 【文艺×繁荣】

## 权力、金钱与文艺繁荣



姚梧雨童：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权力和大量资本的介入可以为文艺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生发出文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景象是否只是文艺“伪繁荣”的“幻象”？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否有实质性的内容和积淀？”

权力、金钱与文艺事业一直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

现在谈到文艺事业，不可逃避的一个问题就是政治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一方面，学者和艺术家需要大量的经费和有力的政府政策维持自己的研究或是创作，另一方面，即使赞助者（或者艺术经纪人）只支付一小部分费用，他实际上也掌握着方向。权力和大量资本的介入可以为文艺事业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并生发出文艺繁荣的景象，但是，这景象是否只是文艺“伪繁荣”的“幻象”？表面的繁荣背后，是否有实质性的内容和积淀？

**金钱与文艺繁荣**

近两年，随着中央“文化体制改革”的号令，各省市县、部门、行业纷纷制定出了自己的文化“改革”宏图，大量资金涌入文艺事业的建设之中：文化主题公园、各种文化性的节日、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等等。有些地方甚至在短时间内就已经“硕果累累”，仿佛真的即将迎来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一方面，政治权力对文艺事业的推动是有力的、高效的，但另一方面，政治权力以及它携带的大量资本的介入，对于文艺事业的独立性产生了不小的冲击。



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艺术家和学者的独立性和批判性受到冲击的来源有：文艺资助（资本对自主权）、新闻媒体、国家（政府）、保守派、自我审查。在这些因素中，文艺资助对文艺事业独立性的影响尤为严重。事实上，现在几乎已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艺资助了，准确地说，它变成了"财产交换"，是出资人的金融财产与受惠人的 symbolique 财产的交换。文艺资助变成了公共关系的手腕。有了金钱的关系，那么必定会出现潜藏的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影响："文艺与科学资助会逐渐使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

独立策展人朱其在分析 798 艺术区的现状时，提到了金钱和商业化运作对艺术产生的另一方面的影响。由于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对艺术市场的影响，原先被冠予"中国当代艺术中心"的 798 艺术区实际上悄悄转型。2010 年后，798 艺术区的业主或出入艺术区的艺术人士逐渐对园区业态抱怨颇多：游客越来越多，只看展览不买作品；咖啡馆、礼品店及服装、皮包等时尚店增多，展览越来越商业化；一些书店、实验空间等学术业态不断撤出。房租的不断升高让一些画廊不得不面临关闭的命运，有些纯艺术机构在坚持办展的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也开始售卖会受到大众喜爱的一些小物件。

798 艺术区正在一步步地"旅游景区化"，人们到这里看展览但不购买画廊展品，然后看完展去喝咖啡、购物和吃饭。由此不难看出，798 艺术区门庭若市的景象实际上根本不是民众"艺术鉴赏力"或者"艺术素养"提高的表现，在虚假繁荣的后面，是金钱和商业化对文化艺术产业的侵蚀。

经济的发展为现代艺术带去了更多为普通民众认识的契机，在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之后，人们开始想要"扩大再生产"的生活，世界各地的美术馆迎来了人流的高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公共现代艺术博物馆被越来越多地改建成消费场所，谁都想分到一块蛋糕。消费主义兴起一方面让大众有了接触艺术的机会，另一方面却给艺术披上黄金外套——浮华、迎合观众、失去了纯真。

**权力与文艺繁荣**

虽然金钱的影响力已经足够巨大，但相比之下，对于文艺事业来说，权力的介入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中央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号令之后，各个领域都掀起"文化改革"的热潮。政策的支持对于文艺事业的发展必不可少，但是学者们有更深层次的担忧：经济的物质增长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繁荣进步，而通过人为主观干涉只能在唯物论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在政治权力的压力之下，政治逻辑介入了生活逻辑，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失去了自我的自主性和独立的批判性。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这一群体所应该具备的最宝贵的是“批判精神”，这种精神的基础在于对世俗的要求与诱惑表现出的独立性，在于尊重文艺本身的价值。在福柯看来，“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去塑造他人的政治意志，而是通过他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分析，对那些自说自话的规则质疑，去打扰人们的精神习惯、他们行事与思想的方式，去驱散那些熟悉和已被接受下来的东西，去重新检验那些规则和体制，在这一重新质疑的基础上（他在其中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特殊任务），去参与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他在其中扮演公民的角色）。”如果政治压力让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失去了批判精神和可贵的独立性，那么文艺事业无疑是“被繁荣”的，它失去了活力，更不用说应该具有的独立和批判精神。

正如陶杰所说：“没有自由和宽容，没有思想的解放，则无真正的文艺，只有专制的复辟，绝无人性的复兴。”

**参考文献：**

1. 皮埃尔·布尔迪厄、汉斯·哈克：《自由交流》
   桂裕芳译，生活·新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6 年 6 月第 1 版
2. 《文化被繁荣？——一五一十周刊第 34 期》
3. 朱其：《798 的商业化和繁荣表象下的困局》
   http://www.artsbj.com/Html/observe/zhpl/wypl/meishu/164881.html

【返回目录】



# 【文艺×中国特色】

## 对传统价值观隔靴搔痒式的反抗



杨不欢：香港媒体人

“

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

”

如果这个“文艺”是当代流行语境下所指的“文艺”，那么我们要从大概 2000 年左右说起。那是一个中国政治和中国人经过低谷的喘息，精神世界重新萌芽的时期，中国第一代没有经历过时代剧痛的人正在步入青春期，后来这些人中部份被第一批冠以当代“文艺青年”称号。那时候，新概念作文大赛开始兴起，国外的流行摇滚逐渐进入中国市场，最早注意到这些的青少年获得了更多表达方式。当时我的高中屹立在一个海岛上，一群十六七岁的孩子与世隔绝于军队式的作息中。在那个压抑的环境里，我那非常文艺的语文老师自创了一种作业，要求全班学生每周写一篇不限字数题材的文章，随机发给其他同学批改。在那个高考作文写作指南为“排比、修辞、三段式议论每句开头总结段落大意、字要写得工整”的世界中，这一任务成为每一个人自由的文字窗口，尽管其中难免充满对青春无病呻吟的新概念作文式内容。

在当时的学校文学社团中，另类的文风也非常流行，以至于对传统的八股高考作文形成了一定冲击。后来新概念和其作者们又把村上春树、博尔赫斯们介绍给中国的年轻读者，就像如今很多摇滚乐手从林肯公园、软饼干入门，却逐渐寻求更深的造诣一样。就在那时，这些当代“文艺”的雏形植根于青年的思想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与平庸、制度化的生活和学习方式的对抗存在——一些学生在课堂上偷偷阅读米兰·昆德拉，把新概念文体带上考卷而不惜获得低分。



很多年以后我和一位港人同事聊起这些，他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读米兰·昆德拉是一种反抗。这时我体会到：中国的文艺带有的这种对抗性无疑是“中国特色”式的：在他看来，昆德拉是一名优秀的作家，但其小说写作并不以反传统著称；许多曾令当时文艺青年豁然开朗的作品，对他来说不过是当代流行的大师文字。但对于这个成长环境中的我们来说是不难理解的，这种对抗背后隐含的是新的生活态度：我可以不按高考要求的方式写作，我可以不参加高考也不会毫无出路，我可以不遵循社会为大多数人设计的那一套大学工作结婚生子的人生轨迹；新概念作家韩寒放弃高考引起巨大讨论的时候，这种对抗曾被摆上台面。可以说，中国文艺的对抗性是被教条催生的，正因为当时社会对天性的压抑之强、对循规蹈矩的推崇，原本未必反传统的内容，也在强烈反差中具备了反抗意味。

文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随后几年凭其魅力赢来不少信众，但她后来在当代社会语境中被异端化的命运，似乎在最开始被冠以“小资情调”这类带有明显阶层意味的词汇时就已被预示。文艺本身无可否认是作为生活的一部份存在的；然而在中国，由于对抗性要求个人对现状进行反思和质疑，文艺与生活或多或少保持了一定疏离。这种疏离最初是源于在刻板轨迹中提升生活质量获得自身心理满足的自身需求，但后来逐渐带上了表演性质——或者是在不具备这种需求的人看来，带上了表演性质。这直接导致了文艺与“草根”的决裂：文艺与“装逼”“无病呻吟”“无实际能力”等刻板印象联系在一起，在公认为文艺青年聚集地的豆瓣网，出现了“银镯女子”“葫芦屯”等通过把文艺和乡土元素结合在一起以讽刺文艺青年的群组。然而实际上这些指责并非真正来源于乡土，更多出于与文艺青年年龄、教育背景都相似的青年群体，并经常武断地将前者的爱好和行为都归于表演动机。

其争执的本质，大概可被视为文艺所暗含的新派价值观与传统价值的战争。但不可否认，这场战争中，反对者们直指中国特色文艺形式繁复、但内容空洞的软肋。

文艺具有对抗性，但其对抗性是局限的。文艺本质是一种生活方式而非价值观。文艺可以是武器，但倘若人不能从思想体系上推翻固有价值，那么文艺就只能是青年在其心灵囚笼中聊以自慰的游戏。而在现实状况中确实是这样的。文艺与悲观情绪似乎密不可分，这一点为许多人所诟病。我一位讨厌文艺青年的朋友认为“不忧伤的就不算文艺青年”。我以为，“文艺青年的忧伤”，无论是通过各种爱情事业等具体事件、还是不可名状的“无病呻吟”抒发出来，本质上都来自于其无法解决现实状态与其反传统理想的落差衍生的无力感。文艺青年是可以不忧伤的：一旦能在价值观的高度跳出框架并真正依这套价值观行事，这种落差自然不复存在。



但这似乎很难达到：文艺精神的内核中遵从天性、注重个人独立想法、追求内心体验和享受等概念显然源于西方，文艺内容中流行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多来自西方。从形式到内涵都是舶来，因此“在咖啡馆中听着爵士乐”比起“在茶楼听粤曲”在感受上更符合“文艺”的定义也绝不奇怪了。多数文艺青年，在仿照了这些西方架步，听了些歌曲、写了点心情文字之后，似乎也仅止步于此，文艺的追随天性和独立思考特点仅被空洞地抄了个形式；文艺领域的创作更是如此。某个出现得惊世骇俗的青年作家，很快能从国外作品中寻得其影子；地下乐队领域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几乎每一只在地下文化中比较出名的中国本土乐队，都可以找出一只“对应”的西方乐队。

这是中国文艺目前的悲哀：文艺最想反对的东西，仍是文艺最大的桎梏。

说到底，文艺本身纯粹是对美的原始冲动，但在中国，她被赋予了特殊的对抗性；也正因为在中国，她的对抗力量被削至最弱。关于追寻天性、独立思考为何是中国青年们如此难以掌握的技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在这里简单地指责国民性缺乏思考精神和创造力、甚至扣上“山寨大国”帽子无疑是方便的，但若如此本文也毫无存在的意义。

不可否认的是，文艺可以无关政治，但政治的强大力量却能影响到方方面面，包括人的生活方式、对事业、婚姻等的传统观念、想象力和创造力，因为桎梏从来都是一脉相承。今年年初，我访问广州 band 村一名摇滚乐手，在此我愿借用他的原话表态——他认为中国摇滚发展最大的阻碍是创作自由的缺乏，而这种缺乏表面上看很大程度来自于乐手自己：“（中国乐手）缺乏创作的原动力和延续性，作品都不够不羁，根本就没有被放逐。每个拿着笔的人，在提笔一刻会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体制的照耀之下，我究竟可不可以将自己想的东西完全抒发出来？’当你有了这个想法本身的时候，你已经失去了创作自由。”

【返回目录】



# 【文艺×理想】

## 做一只两岸间的文化蜜蜂



笑蜀：作家，专栏作者

“求学台湾不仅仅是为了读书，为了专业发展，否则不如留在大陆求学。去台湾就肩负了文化蜜蜂的使命，把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的台湾文化的花粉点点滴滴地衔回大陆，播种大陆故土，改造大陆文化，应该是义不容辞，若有收获，其功不在当年留美留日生之下。”

网上读到大陆国台办负责人的一段讲话，我不禁眼前一亮：他在会见台湾陆生代表时，居然鼓励陆生多与台湾学生谈恋爱，了解台湾思想文化。

说“居然”，是因为就连在大陆，大学生谈恋爱都未必是受鼓励的事，能容忍就算不错了。现在官方公开鼓励台生与台湾学生恋爱，真是开天辟地第一遭。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大陆到底还是在进步中，也说明两岸交流不仅越来越充分，而且越来越人性化。在这个当口到台湾读书的同学们，可谓生逢其时吧。

既然生逢其时，就当特别珍惜。

一部中国近代史，很大程度上，是被中国留学生改写的。哪些中国留学生呢？第一是留美生，第二是留日生。他们不仅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在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这正是今天在台湾的陆生可以参照，可以学习的。当然，相比当年美国和日本，台湾的物理体量未免太小。但这并不能削弱台湾对于当下中国转型的价值。而最关键的是模板价值，即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化转化的模板价值。百年中国转型，无论美国，日本，还是苏俄，都借鉴过了，但是，借鉴美国和日本，效果固然不理想，借鉴苏俄，更是造成普遍奴役，普遍灾难。而无



论借鉴的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都无一例外的属于舶来品，就算好东西也难在本土扎根。

台湾正好在这方面起到巨大示范。无论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台湾都可以说是，对中华文化进行现代化改造的一个试管。而且是一个极其成功的试管。

我有幸于去年 3 月起游历台湾整整两月，最让我感动的，是台湾的文化之美，即台湾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这种人情人性之美，几乎无微不至地体现于台湾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说穿了，是台湾普通人的生活方式之美。在我看来，这正是台湾与大陆相比，最特异之处，也是最大魅力所在。

而这种文化之美，显然是文化融合的结果。百年来涌入的日本文化，欧美文化，跟台湾本土文化，跟中华文化相遇，犹如不同元素交汇不断引爆化学反应，最后生成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即今天的台湾文化。它集合了多元文化最优秀的基因，无疑是中华文化这个巨大的文化系统中，最现代，最精粹，最美好的一部分。

而当下中国最缺什么？最缺文化。六十年党文化的荼毒，对文化的破坏千古仅见，导致当下中国的文化溃败即人心溃败。当下中国文化即中国人心急需疗治，已是不容争辩。台湾文化就成了重建中华文化的惟一支点，称之为中华文化现代化转化的诺亚方舟，绝非过誉之词。

所以，台湾对于中国转型的价值，是不能用区区物理体量去评估的。台湾虽小，其潜藏的文化能量或者说精神能量却堪称伟岸。有这样伟岸的台湾文化示范大陆，乃中华之幸，中国之幸。

如前所述，这文化不是别的什么，没那么高远神秘，这文化就是台湾的人情人性之美。陆生留学台湾，首当其冲，朝朝夕夕皆可沐浴这人情人性之美，岂非大幸？求学台湾不仅仅是为了读书，为了专业发展，否则不如留在大陆求学。去台湾就肩负了文化蜜蜂的使命，把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的台湾文化的花粉点点滴滴地衔回大陆，播种大陆故土，改造大陆文化，应该是义不容辞，若有收获，其功不在当年留美留日生之下。

这，或许算我对台湾陆生的一点小小渴求？

【返回目录】



# 【科技×正义】

## 一个难题



韩松：科幻作家

“

希特勒和罗斯福当时都在争夺原子弹的发明权，最后是“正义”的一方亦即盟军一方拔得头筹。但很快原子弹被斥为一种不人道不正义的武器，尤其是广岛长崎之后。后来则有了核不扩散条约。当朝鲜试图拥核时，它被指责为是不正义的。朝鲜则认为指责者不正义，凭什么你们可以有，我却不可以？无核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连领导人不也都被“正义”的主持者打死了吗？

”

对于许多希望坐火车在春节期间回家团聚的中国人来说，买到一张车票有时像登陆月球一样困难。

因此，铁道部开通了一个网上订票系统来帮助缓解这个困难，但是，许多用户抱怨说他们网站拥挤不堪，而且这个系统设计得是如此糟糕，运行得像蜗牛一样慢。

为了让这个系统变得方便一些，有人就设计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型高科技产品“抢票软件”。该程序能够不停地自动刷新，帮助用户完成订票过程。这样，大家就不用绝望地坐在电脑前花去大把时间精力不停刷屏了，而是可以一边看喝咖啡看电视，一边等着机器把票订上。

这项惠及亿万民众的发明本应该列入二零一三年的十大科技新闻，但意外的是，忽然传来了消息，工信部决定叫停它的使用。虽然后来又有消息说，工信部并没有叫停，而只是打了电话与运营商“沟通”，不要因为这个软件的使用而造成“麻烦”，但这件事还是在春运期间成为了焦点热点话题。



据媒体报道，害怕造成“麻烦”的一个理由是，这个软件可能会“伤害到弱势群体”，造成“社会不公”。

的确，当这个软件极大地提高了网上订票速度的同时，那些没有使用它的人开始抱怨，由于机器的高效率，票在一秒钟内就被订完了，他们根本没有机会。而对于那些没有什么互联网和网上经济知识的农民工和老人来说，这更是一场灾难。

这似乎是科技与正义悖论关系的一个例子。所谓正义，常常指的便是公平、公正。如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正义与否的客观标准主要在于其行为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与广大群众的利益。争取公平的行动就是正义。但科技的发展往往并不能带来预期的公平和公正。

不管怎样，为了让一切回到正义的轨道上，代表公众利益的政府部门于是出面，试图利用行政手段干预一项技术发明，从而防止出现负面的社会效应，从而激起弱势者的不满。这似乎表明，我们宁愿看到互联网革命的步伐慢一些，也不愿看到愤怒的农民工掀起一场迅速的革命——占领火车站，把售票柜台砸了。

任何一项科技发明都会是一把双刃剑，从原子能到生物工程，几乎每项现代发明都会造成道德困境。

但是在中国这个格外重视政治和道德价值的国家，冲突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发誓要在二零二零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全社会的研发投入在二零一二年首超万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

另一方面，更多的中国公民近些年对现代技术的应用表示了更强的反对，包括示威抗议化工厂（哪怕有的已具备了很高环保标准）的建设和拒绝使用转基因产品。甚至高铁也遭到了新一轮炮轰，原因是有人传言称列车“辐射太强，会引发癌症”。

有些人开始担心技术发明会导致这个民族的分裂，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就好像是未来学家和科幻作家担心的，由于最先进的技术被富人垄断，这些人率先实现身体和智力的进化，而成为超人，今后人与人的差别，就跟狗的差别一样。不同阶层的人，将成为不同物种，连交流都不可能。这是就是未来的可怕一幕。似乎是科技的发展导致了正义的丧失。但争论者认为，这与科技无关，而是制度和机制的缺失。

不管怎样，中国都陷入了困境。在这个国家，用来表示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去年达到了危险的零点四七。因此，对于政府部门来说，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了首要任务，官员们正不惜余力采取措施，要为弱势者带来“公正”和“公平”。

但是，过多的政治伦理干预也或会使中国最优秀的发明家感到泄气。这些人的头脑里有着最勇敢的创新精神和最奇异的点子，许多人认为创造发明只能通过探究物质世界的真相来获得，而不是过多地讨论政治和伦理。

还有人觉得，最新的发明创造，在扩散到大众之前，往往最初是由特定群体享用的，他们通常是较富裕的人群，甚至是较有权力的人群。比如，汽车和飞机就是这样。在古代，皇帝是炼丹术的最大享用者，而炼丹术则是那时的高科技。这乃是因为科技是有成本的，它不是无偿使用的，只有到了一定时候，它才能从特定人群扩散到普通人群。计算机也是这样，最初要占几个房间，属于国家的专利。

抢票软件的发明者因此感到很委屈，他在博客上贴出一篇长文，抱怨政府部门误会了他的良好初衷。

一个可能是，对于正义的过分强调，独立的科学家、技术人员以及企业家在发明新事物前会变得犹豫，因为他们担心这个发明的应用可能会因为政治或社会的原因受到禁止，这样他们的投资也就打了水漂。

当很多中小企业根本就缺乏渠道获得有关什么才是政府认为是道德政治正确的信息时，问题就变得更严重了。

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议题。常常很难评判何为正义。希特勒和罗斯福当时都在争夺原子弹的发明权，最后是“正义”的一方亦即盟军一方拔得头筹。但很快原子弹被斥为一种不人道不正义的武器，尤其是广岛长崎之后。后来则有了核不扩散条约。当朝鲜试图拥核时，它被指责为是不正义的。朝鲜则认为指责者不正义，凭什么你们可以有，我却不可以？无核国家如伊拉克和利比亚，连领导人不也都被“正义”的主持者打死了吗？

这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题目。当前我们要考虑的，也许是如何在政治伦理标准和科技创新之间保持一种微妙而可靠的平衡，这将是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将对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智慧提出挑战。假如不能很好地处理，中国经济转型的目标就有可能落空。而科学技术的创新正被认为是中国未来获得成功的核心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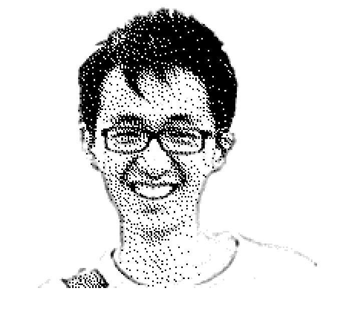
应该怎么办呢？是继续增加党代会或人代会上的农民工代表名额，还是尽快补充科技发明家的人数？还是让一些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参加到政治中来？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返回目录】



# 【科技×理想】

## 科技产品能让信息流动达到“理想”状态吗？



黄海：一五一十周刊编辑

> 人类的天性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同，这也许和技术进步无关；但技术倾向于放大和强化这些人性的弱点，让个体更易惧怕孤独，更易惧怕不被他人认可。

信息科技的发展让人类获得信息和处理信息达到前所未有的丰富与便利。

科技产品首先改变了人类的记忆方式：人用大脑记忆，但它有诸多缺陷：容量不大，事件在记忆时被简化为轮廓，回忆时脑补细节。现在人类可以通过手机等智能设备记录一切生活细节，随时随地和朋友分享。

个人记忆方式属于私人生活变革，信息传播则属于公共生活领域，它同样受到冲击。技术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微博让一切新闻瞬间传遍全球，Kindle 让读书不受书本重量限制，iPad 杂志也在逐步取代纸质出版物，获取知识对人类来说从未如此方便。

与饮食和睡觉一样，对信息的渴求是人类的天性，科技产品的进化正好满足并强化了人类这种本能的需求。从智能手机到智能眼镜，科技发展让智能设备无处不在，信息越来越唾手可得，我们也越来越习惯这种“永远在线”的生活方式。然而，在创造无限可能性的同时，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也对人类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谷歌董事长施密特曾说：“如果你不想让别人知道某件事，或者你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做。”——他是在为人们对谷歌对隐私信息保护不足的指控辩护。但施密特和谷歌忽略了重要的一点，很多时候人们希望保存隐私，不是因为羞耻，而仅仅是因为需要私人空间。在这个数据为王的年代，算法能从人们网上行为中提取的信息，可能比人类对自身的认知还要深入。影视网站 Netflix 敢于投巨资制作电视剧《纸牌屋》，是因

为 Netflix 的个性化推荐系统显示英国 1990 年的同名电视剧广受欢迎，而且喜欢该类政治惊悚剧的人群又倾向于喜欢有凯文·史派西参演或者大卫·芬奇导演的作品。



更让人惊叹的是，在《黑镜》第二季第一集中，女主角因为思念逝去的男友，根据男友生前的社交网络信息创造了一个虚拟体，这个虚拟体的思想、行为甚至生理特质都能完美模仿真正的男友——若你觉得电视剧情节纯属虚构，近日已有美国公司提供类似服务了：根据生前的推特信息，为死者提供死后继续发推的服务。当有一天刷微博的时候无法分辨发出者是生是死，我们该如何理解互联网与人类自身的关系？

除了无处安放的私人信息，对科技产品的依赖让我们更容易孤独。在微博和 Facebook 的年代，个体习惯一切发言都理应获得转发和回应。社交网络像是技术赐予每个个体的舞台，个体的思考和表达在与“观众”（粉丝或好友）的互动中获得存在感。在这样的环境下，自我表达容易变成一种演出，一旦得不到回应，个体就可能为了获得社会认同而扭曲自我，刻意迎合。人类的天性是希望得到社会认同，这也许和技术进步无关；但技术倾向于放大和强化这些人性的弱点，让个体更易惧怕孤独，更易惧怕不被他人认可。习惯了全天在线的生活方式，要摆脱科技的操纵，在独处中保持精神强大的自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如技术哲学家凯文·凯利所说，技术系统有自身的生命力，其发展轨迹不以人类意志转移，不能用简单的“好坏”来判断，更不会创造理想的乌托邦。人类需要思考的是，怎样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大潮中，怎样最大程度的利用科技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被科技吞噬。

**参考文献：**


1. 破破的桥：硅谷科技趋势背后的理念变革

2.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fc0caa01018c6x.html

3. 凯文凯利：《技术想要什么》

4.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返回目录】



# 【公共卫生×中国特色】

## 微博时代的医患关系

朱蓓英：医学生

“

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信息传播越来越顺畅的时代，不可能为了维持天使的形象而禁止医疗行业的人在网络上随意地谈论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制止对医疗服务不满的患者们表达他们对行业的不满。所有人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脱敏过程。

”

最近，微博上出现了一个新账号，叫做@我的病人家属是极品。这个账号的渊源是：之前有一个很红的账号叫做@我的前任是极品，极大地满足了大家的吐槽欲，于是极品家属账号也因为医务人员强烈的吐槽欲应运而生。

极品家属发布的微博大致可分为几类：医务人员眼中的极品，例如因为护士打针没有一阵见血而恶语相向、威胁投诉，勉强医生开超出处方系统限制量的药；所有人眼中的极品，比如在病房大庭广众之下啪啪啪，导致血管瘤破裂反而怪医生没有及时拉开他俩；正能量，例如悉心关注的农村患者专门回来找到医生送点土特产……

这个微博一出，很快得到了很多医疗行业人的追捧，同时也可以预见地遭遇了一些微博用户的愤慨：指责病人和家属“极品”实在是太缺乏医德了！而“极品家属”账号的主人显然也是性情刚烈，公开表示对“医德”一词过敏，凡是评论医务人员缺乏医德的一概拉黑。

公平来说，在背后吐槽其他人的丑事确实不算光明正大的行为，无论对象是自己的前男/女友，还是病人。无非因为人性中存有那么些可怜的小趣味，通过贬低其他人得到自我满足，通过分享一些不能大范围传播的“秘密”而拉紧八卦者之间的联系。但人们对吐槽前任喜闻乐见，而吐槽病人家属则心怀愤懑，无疑是因为紧张的医患关系的大背景。



医生护士看病跟电信客服办理业务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直接跟人打交道的工作，并且三教九流各色人等都是潜在的客户。出现不合作的、不讲道理的、沟通困难的患者是必然的事。无论是今天，还是 30 年前，一定都有医生抱怨过“难弄的患者”。差别在于，过去他们只跟同事朋友抱怨，抱怨完了就完了，而今天的医生会到微博上抱怨，抱怨完了会被陌生人看到，于是互相引起嫌隙。因为 SNS 网络的出现，过去医患之间存在的窗户纸被捅破了。

老话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无论是让患者不满意的医护，还是让医护感觉“极品”的患者，在数十上百次医疗活动中，只要出现一次就足够给人深刻的印象，继而传播给其他患者和医疗人员，让人对“医患关系”这件事形成负面印象。而 SNS 网络的出现，无疑加快甚至加剧了这一过程。

几个月前，我也曾经在微博上吐槽过一次。做实习医生几个月，因为是个小个子的女性，频频被病人认作护士，要求做一些护士的工作。这只是小误会，每次也只是告诉患者这事应该找护士，护士在护士站，她们戴帽子，我是医生。不过次数多了也会有不爽的感觉，于是在微博上咆哮了一通。不多时有个陌生人就到我微博底下来回复，言辞激烈，指责我没有医德，还将微博转发给了我们医院的一位科主任，说要领导来收拾我。看到如此回复，我感到又可气又可笑，虽然那位科主任并非我科的，主任也未必知道我是谁，就算知道我是谁应该也不会为了这件事来收拾我，但为了少费口舌我还是把这条微博删了了事。

不知道是否应该归因于我朝的“天使教育”，长期以来，人们印象中的医生护士个个都是如同天使般纯洁无瑕。一旦有一个窗口发现了医疗行业人私底下的工作生活，和天使实在相去甚远，难免产生愤怒的情绪。然而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希望重病人不要在自己值班的时候死亡，希望收治病情平稳不会出状况的病人，夜班被叫起来心情会很差，医院其实很重视经济效益。

可是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这个信息传播越来越顺畅的时代，不可能为了维持天使的形象而禁止医疗行业的人在网络上随意地谈论自己的生活，更不可能制止对医疗服务不满的患者们表达他们对行业的不满。所有人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脱敏过程。医护的底线是，遵守法律，依据医疗行业规范（指南）行医，而患者的底线是不得对医院工作人员实施暴力行为，不得干扰医院正常工作的开展。

对于个体而言，多高的道德修为标准都不算过，但对于群体而言，严守底线前提下的相互容忍或许是缓和矛盾的良方。 【返回目录】



# 【家庭生活×自由】

## 根和翅膀


冉云飞：作家

“

**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

某编剧朋友某天在微博上吐苦水，说家人希望她早些结婚，找份安定的工作，赚多点钱。底下评论的朋友也大多在说类似的故事：青春期时候和父母关系不好，很难沟通；即使长大后，交流也还是有隔阂，父母不是权威式大家长般的存在，就是永远说不了几句话的尴尬亲人，工作结婚这类人生选择都不自由。

世俗观念中，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总是充满了“不求回报”的爱。然而，我们看到的有些家庭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还是别别扭扭。以爱之名，捆绑住手脚，动弹不得。家庭教育在亲子关系当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父母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施加者，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有怎样的家庭生活。

美国心理学家戴维·埃尔凯特在研究报告中认为“当好父母，最基本的是要给孩子两样东西：根和翅膀。真正意义上的根，是给孩子无条件的接纳和爱，用心守护孩子能够得到当下的快乐和幸福；真正的翅膀，是尊重孩子的天赋秉性，给孩子最大的自由，引导孩子做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并承担责任。”

然而，在为数不少的父母眼里，根，就是富足的物质生活，翅膀，是相较于其他人最多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胜人一筹。我们很多时候，把生活只当作是竞争，甚至把竞争当成是生活的全部。生活免不了竞争，但竞争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就像你一生都要走路，但跑步甚至通过跑步争个输赢，与走路相比并不是常态。但很多父母把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当作自己教育子女的不二法门，认为只能如此才算“成功”。为什么不做个踏实的普通人，非得要去做“人上人”呢？在人上



面，骑在人的头上，不平等待人，成王败寇的变态成功学在吾国有深厚的土壤。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曾想起过作家王小波的话：一个人拥有此生是不够的，还要拥有诗意的世界。

只有父母给孩子快乐，无条件地接纳孩子才是最牢固的根。有人一看无条件接纳孩子，就皱眉头。无条件不是放弃了父母的教育之责了吗？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已成为我们不少人的内在痼疾。养儿防老、光宗耀祖的育子观念，至今仍在中国相当盛行，这固然有制度和政府不作为的原因。但我们父母把育子当作投入与产出的生意经来念的想法，依旧很强旺。由于有这样的观念，我们的爱中就有很多逼迫、强加，到处充溢着不尊重、不平等，并以自己的经验来代替子女自身的选择。

换言之，不管子女出色与否，不管他是否“输”在起跑在线，父母都应该爱他们，接纳他们。不能以势利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儿女。改善这样的家庭关系，家庭之爱才会变得文明而正常。有文明而正常的家庭关系，父母对子女的爱，才不会掺杂那种不必要不得体的、强加与逼迫的私念。更进一步地说，有了良好的家庭之爱，孩子才真正有根的感觉。哪怕孩子历经千辛万苦，还是依然能体会和感受父母曾给他的大爱。那种内心无比柔软的爱，会内化为他骨血的一部分，生生不息，就像树之根深叶茂一样。

至于给孩子翅膀，尊重他的选择。说来容易，做起来却远非易事。很少有谁公然反对自由，但对自由的曲解在我们这里却有极其广袤的土壤。以为给孩子自由，就是叫他百事可为，没有比这对自由更粗鄙更污名化的说法了。具体到对待孩子的自由，那就是尽量尊重他们的选择，因为他是他自己，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没有谁能代替他自己面对复杂而多变的生活。他也用不着去复制谁的人生，哪怕是爱因斯担、华盛顿、马尔克斯的人生，也没有必要去当跟屁虫。不懂自由的父母，也无法懂得真正的爱。爱与自由，根与翅膀，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父母的身教胜过言传，知行合一，会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显示出它无穷的浸润力量。经常有人抱怨我是爱孩子的，可是他为什么不领情呢？除了爱的不得体强加和愿望转嫁外，记住心理学家弗罗姆怎么说，或许不无裨益：“最困难的一种爱，就是对我们自己孩子的爱，因为整个目的就是爱他们，以便他们可以离开我们，接管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由地选择他们的想法和行动。”

【返回目录】

# 【个人成长×另类】

## 贵族少女的逃亡



谢彤：香港独立媒体记者

“精英圈的人一般只会跟“圈中人”来往，缺乏成就因此就意味着，要被从小相处的人排挤。以医生或律师作为志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即使不是天才，只要努力，就可以当上他们认同的精英，不需要被排挤和冷落。”

最后一次跟少女 M 通话，是在两年前的夏天。那时我还没有戒掉深夜在街上散步的习惯，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路，让我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在闷热的夏风中，我倾听少女 M 的自白，那个曾经把我当作哥哥般信任的女孩，此刻却让我觉得遥远且陌生。“我的压力很大，大得快要崩溃。”她的语气严如受害者，然而在大部分人眼里，她属于得天独厚的一小撮人。

少女 M 来自典型的港式精英家庭：家住九龙塘，父母都是中上产阶级，和姐姐一起在香港最贵族的女子中学拔萃女书院上学，男朋友则是麻省理工大学的学生。父母的用心经营亦让她拥有成为精英的素质：优秀的学业成绩、英语能力和课外活动经历是进入精英圈必备的入场券，而社交技巧的早熟亦预示，她能在精英圈里如鱼得水。

和她背景相似的人，构成了我中学时社交圈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读的中学拔萃男书院，是拔萃女书院的兄妹校。学校里虽然也有我这一类的穷学生，但来自精英家庭的学生仍属主流。印象中，我没有很妒忌他们，因为差距太大了，反而没有真实感，而且他们基本上都对我很好。只是，我很早就觉悟到自己难以成为他们，因此我一直没有强迫自己成为他们。

在精英圈里，好胜的人是可悲的。就算如何努力，始终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隔在天才与凡人之间。甚至要当一个不甚瞩目的人才也不容易，因为有太多的人拥有相近的条件了。在我的中学，当你告诉人家“我钢琴弹得不错”，你起码要有演奏级的级



数，才不至于让人笑话，那只是进乐团的基本条件。至于“我很会弹琴”——那是黄家正那个级数的人才有资格说到话。（就是因纪录片《KJ 音乐人生》而闻名的天才音乐家。我跟他曾是一年的同班同学。然而除了记得他喜欢阿仙奴，我对他没有多少记忆。）

因此对少女 M 这种人来说，过早了解现实，让他们确实地看到生命残酷的一面。至于看不看得到美好那一面，就要看缘分了。

父母的期望、同侪间的比较，这些有形无形的压力，让他们必须达到受精英圈认可的成就。精英圈的人一般只会跟“圈中人”来往，缺乏成就因此就意味着，要被从小相处的人排挤。以医生或律师作为志业，是比较合理的选择：即使不是天才，只要努力，就可以当上他们认同的精英，不需要被排挤和冷落。

在少女 M 的自白中，我感受到一股无力感。选择留下，就要继续面对压力；选择逃亡，就是否定自己的过去。

对于少女 M 的境遇，我无能为力。我想过要改变他们，在更年轻的时候。但生活的经历让我体会到，我没资格认定自己的信念才是正确的。只有上帝或上天才有资格审判一个人的生命。身为人的我，只能照我的想像去演绎我的生命，让那些认同我、受我打动的人跟随我的方式面对生命。然而我亦无法保证，自己的生命一定过的比他们好。

也许有一天，当我的精英朋友老去后，他们会突然醒悟到自己一生都在满足别人的期望，并为自己白纸一般的人生而唏嘘不已。而到我老去后，会后悔当初没有努力成为精英，并因为中年以后才发作的成就缺乏抑郁症而感受到同等程度的唏嘘。

然而那次和少女 M 的通话，让我久久不能释怀。我感觉这不是她想要过的生活，然而她好像没有其他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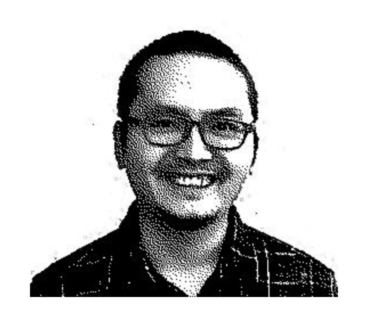
标题里的逃亡，从来没有在现实里发生过，甚至不曾发生在少女的想像世界里。它是我的夙愿，亦是我写作的动机。文字作为想像力释放的契机，或许，是促成少女逃亡的最后一块拼图。

【返回目录】



# 【个人成长×理想】

## 成长是放弃成为什么



安猪：多背一公斤公益机构发起人

“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方向未必是坏事。这反而能让你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最可悲的一种情况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进什么样的公司，多少岁要买车买房，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爬到什么样的职位赚多少钱……这样的成长你想要吗？”

成长是个蛮大的话题，我想从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来现身说法一下。

其实我是一个比较“慢”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太清楚自己该走怎么样的道路。考大学的时候，我不知应该报什么系，就填了一个分数最高的。毕业之后也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以为最好的道路就是进一个大公司，获得更高的职位，领更多的薪水。可是，在工作了两三年后，我就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喜欢在企业中的工作，当时在电信公司上班，一到周日我就头疼，因为很焦虑周一的工作。随后我换了不少工作，但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直到后来我开始做志愿者，才发现自己喜欢这样的工作，但也只是单纯的喜欢，并没有想到做成自己的职业。

我在 2004 年发起了多背一公斤活动，到了 2006 年，因为活动的影响日渐增长，我开始考虑是否需要全职出来做。但当时在中国做公益是一个没有“前途”的职业，所以自己一直犹豫了两三个月，直到后来我改变思路，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出来做三年，最大的损失是什么？我能不能承担这个损失？”我发现我最大的损失不过是我可能在三年后发现自己无法全职来做公益，而后果不过是重新回到企业里面工作。这个后果是我可以承担的，于是就马上向老板提出了辞职。

所以，我辞职进行公益创业并不是人们想象的我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计划，实际上，我完全是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跳入公益领域的。



即使在全职做公益之后，我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团队发展的方向。从 2007 年到 2011 年，我和团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公益项目或产品，例如我们做过一个 Twinbooks 的项目，每在城市销售一本儿童图书就向乡村学生捐赠一本同样的图书，又例如我们做过乡村学校图书室项目，做过公益贺卡销售（每卖出一张 10 元的贺卡就向乡村小学捐赠一本图书），甚至做过一个希望解决小区问题的网站，这些项目的成果都不算很差，例如 Twinbooks 卖出了两千多本，图书室我们搭建了一百多个，公益贺卡我们卖了一万七千多张。但算下来，这些项目都没有取得我们预期的成功，它们或在模式上无法自我造血，又或者无法从更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但这个过程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我知道怎么去判断一个项目或产品能够在多深多广的程度上影响社会，也知道怎么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快速设计和完成一个项目，这些经验和知识也使得我们找到了现在所投身的产品：一公斤盒子。

回顾这么多年的职业和公益创业历程，我实在无法说出一个清楚的自己的方向（即使在今天我也说不出），我觉得这才是生活的真相。许多成功故事中的“远大理想”更多的不过是事后聪明的总结，而实情是，成功者在未成功前并不确认最终的方向，他们会有许多的变化甚至是转型。在创业故事中有大量这样的例子，例如 twitter 的团队最初做的是一个播客平台，在开发产品过程中团队发现有大量传输简讯的需求，于是做出了 twitter，结果没想到播客平台没被市场接受，反而 twitter 爆红。又如 Pixar，原来是做 3D 动画软件的，为了销售自己的软件它们自己制作动画来展示软件功能，没想到动画制作能力得到大众的肯定，Pixar 最终也转型成为动画制作公司，为世界创作了《玩具总动员》、《虫虫特工队》、《汽车总动员》等等的经典。

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没有方向未必是坏事。相反，这反而能让你有更开放的心态去尝试不同的可能性。最可悲的一种情况是，在读大学的时候就确定了要进什么样的公司，多少岁要买车买房，多少岁要结婚，多少岁要爬到什么样的职位赚多少钱……这样的成长你想要吗？

想想生命的成长是怎么样的吧。一棵树的成长并不想要成为什么，它只是吸收阳光和雨露。一个小朋友从六岁长到七岁，他也不需要一个这样的目标：身高从 53cm 增长到 65cm，体重从 37kg 增长到 43kg……他只是好好的吃，好好地玩，成长自然而然地就发生了。

真正的成长不是靠计划、靠控制来完成的，相反，成长需要我们忘记目标，忘记成为什么的野心，而把注意力放到当下，去倾听、去理解、去学习。

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真义。 【返回目录】



# 【个人成长×自由】

## 如果我女儿性开放怎么办



颜纯钩：笔名慕翼、斯人，作家、评论家

“

如果我女儿觉得性开放对她是一件开心的事，为什么她不能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身体？她只要采取充份的安全措施，不会择友不善被人欺侮，那么她就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好了，与我何干？

”

有的评论有点刻毒，问我是不是希望我的女儿也性开放。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啊，女儿要是性开放，我能拿她怎么样？

认真想一下，我只好承认，我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对付她。

女儿在温哥华读中学时，因为衣着暴露，时常要和她母亲吵架。那几年我回香港工作，她们不时在电话里各自向我投诉。我太太是古板人，看到她上学穿吊带背心就受不了，但有一次她苦笑说，女儿离家时穿得很密实，但把车子开出车库外，就把外套脱下来了，里头穿的还是吊带背心。我说是啊，你能拿她怎么样？不如“慳番啖气暖肚”（意思是省回一点气力暖肚子）。

有一次我和女儿开玩笑，说你再不听话，我以后不供你读书。她想都不想就顶回来，说：你敢不供我，我告得你裤子都掉下来。在加拿大，父母亲有法律责任要供孩子读书，女儿老早就懂得自己的权利，也懂得如何为自己做主。

她在香港电视台新闻部工作时，几乎每晚都与同事吃消夜泡酒吧，搞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睡觉，那时我们也从没有问她，到哪里去了，做了什么，是不是和男朋友乱搞，我们只是劝她早一点回家，要保证睡眠，注意安全。

在香港十八岁就算成年了，可以看三级片，至于交男朋友，十岁都没问题，与未成年少女性交是犯罪，但与成年女性发生关系，只要双方同意，属于个人自由的一部份，



而且对男女双方来说，都没有数量之限。假设我们知道她滥交，把她关在家里不让出门，那要干犯禁锢他人的罪名，把她打一顿，身上落下伤痕，她也会把我们告将官里去。

对我们这一代来说，性滥交自然不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但新加坡前几年有一个女子，宣称与数以百计的男人上床，准备打破纪录云云。最近又有一个女子作此壮举，甚至还得到丈夫的支持。“世风日下”，你有什么办法？她们走得太远了，而我们也别回到文革年代去吧。

如果我女儿觉得性开放对她是一件开心的事，为什么她不能自主地处理自己的身体？她只要采取充份的安全措施，不会择友不善被人欺侮，那么她就去追求自己的快乐好了，与我何干？万一她因为性开放而受人欺侮或惹上爱滋，那也是她自己需要付的代价。她是成年人，在没有性开放之前，应该懂得这件事的轻重，准备接受最坏结果。

在大陆谈性开放，似乎还有禁忌，但多少性罪恶披着道德的面具在进行着。最近天下闻名的衣俊卿，还是中央编译局的局长，还是大教授、部级干部呢！那些被揭露出来的贪官，无一不有玩弄女性的罪行，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还说：当官的不搞钱不玩女人，当官来做什么？说到底，真正需要谴责的，不是性开放，而是以金钱和权势来玩弄女性，对于玩弄者与被玩弄者，都不是意识上的性开放，因为真正的性开放，是不附带任何钱权因素在内的。

我时常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我家乡那个古板的小镇上，男女青年谈恋爱都是不许可的，说是“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我们学校文艺宣传队里，有一男一女偷食禁果，当下被开除出校，一生的日子都毁了。当年我和太太谈恋爱(我都二十六七岁了)，小镇上没地方好去，有一个晚上走到母校的操场上去晒月光，操场上有一群孩子在玩，发现一男一女躲在昏暗角落里，就围上来起哄。谈恋爱要被小孩子“围观”，令我们大窘，最后只好落荒而逃。这群孩子跟在我们身后又叫又笑，简直当我们干了什么下流勾当。第二天，几乎大半个镇子上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我庆幸这样的日子也一去不回头了，现在的年轻人，可以堂而皇之地拍拖，只要他们愿意，也可以偷尝婚前性行为的禁果。至于要不要性开放，开放到什么地步，那全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有权作这种选择，谁也奈何不了他们，父母奈何不了，政府也奈何不了。

（本文首发于腾讯“大家”）

【返回目录】



主编：方可成

编辑：冯自强，黄海，刘垚，童亚琦，王陶陶，姚梧雨童，宗洁，舒欣

设计：潘雯怡，王添裕

校订：王菡

出品人：杜婷

若希望订阅此电子周刊 doc 版请发空邮件至 cochinaweeklydoc+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若订阅 pdf 版请发送至 cochinaweeklypdf+subscribe@googlegroups.com；mobi 版至 cochinaweeklymob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epub 版至 cochinaweeklyepub+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此电子周刊由「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志愿者团队制作，「我在中国」（Co-China）论坛是在香港注册的非牟利团体，论坛理事杜婷、梁文道、闾丘露薇、周保松。除了一五一十周刊之外，Co-China 每月还在香港举办论坛，并透过网络进行视频、音频和文字直播。2012 年开始 Co-China 在香港举办面向青年的夏令营，第一届主题为「知识青年，公共参与」，2013 年夏令营的主题是「始于本土：本土、国家、世界冲撞与协商」。

Co-China 论坛网址：https://cochina.co

Co-China 论坛新浪微博：CoChina 論壇（http://weibo.com/1510weekly）

Co-China 论坛 facebook：「我在中國」（Co-China）論壇（https://www.facebook.com/CoChinaOnline）